

全球對話

15.3

GLOBAL DIALOGUE

一年出版三期, 以多種語言刊出

紀念 Michael Burawoy 特刊

Michael和 兩個Karl

Klaus Dörre
Brigitte Aulenbacher
Roland Atzmüller
Fabienne Décieux
Raphael Deindl
Karin Fischer
Johanna Grubner
Nancy Fraser
Ngai-Ling Sum
Bob Jessop
Heidi Gottfried
Michelle Williams

Michael、公共 與全球社會學

Geoffrey Pleyers
Nazanin Shahrokni
Ruy Braga
Pavel Krotov
Tatyana Lytkina
Svetlana Yaroshenko
Fareen Parvez
Aylin Topal

致敬辭

Ari Sitas
Shaikh Mohammad Kais
Siyabulela Fobosi
David Goldblatt

議題開講

> 屬於社會學的時刻

MAGAZINE



International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isa

第15卷/第3期/2025.12
<https://globaldialogue.isa-sociology.org/>

GD



> 編輯的話

紀念 Michael Burawoy 特刊

作為紀念 Michael Burawoy 於 2010 年創立的《全球對話》創刊 15 週年慶祝活動的一部分，我們在今年一月與他達成一致：本期刊將專門用於回顧過去十五年來公共社會學與全球社會學所取得的進展。

Michael 對本期刊的願景充滿了野心，正如他在私人信件中所說的：

「Breno，我認為《全球對話》的 15 週年舉辦一期特刊，是個絕妙的主意。也許你可以從各區域收集稿件（儘管這可能是個挑戰），或者將重點放在動盪時期公共社會學面臨的一些主要挑戰上，例如檢視當今的重大議題——戰爭、氣候變遷、不平等和墮胎——所有這些都應透過全球視角來審視。另一種選擇是邀請那些可能寫出有趣內容的人來撰稿。還有一個可能性是向各研究委員會（RCs）發出徵稿通知，請他們提供文章。你可以徵求提案。儘管大膽地想吧！」

不幸的是，Michael 於 2025 年 2 月 3 日在一場肇事逃逸事故中悲劇性地離世了。在他逝世後，各方的悼念與追思如潮水般湧現，真摯感人。2 月 8 日，國際社會學會（ISA）組織了一場線上追思會以紀念 Michael Burawoy。在過去的幾個月裡，來自全球各地的同事、學生、行動者和組織都在緬懷他那敏銳的才智、慷慨的精神，以及對社會正義的奉獻。

Michael 作為導師、公共知識分子和轉型學者所產生的影響力，啟發了全球數以千計的社會學家。他的遺產涵蓋了他在勞動與民族誌方面開創性的工作、對公共社會學的深切承諾，以及透過他的指導所培養出的全球思想家和行動者社群。

因此，本期刊如今不僅是為了慶祝公共社會學的現實意義，更是為了紀念 Michael 的生平與遺產。我們藉此同時慶祝《全球對話》的 15 週年，並透過 Michael 的學術生涯與貢獻來反思公共社會學和全球社會學的發展。為此，我們邀請了 Michael 來自世界各地的同事、學生和朋友，分享他們對其成果的見解、分析，以及與他共處時刻的個人回憶。

本期刊圍繞三個主題脈絡書寫：第一條脈絡由《全球對話》的前任編輯 Klaus Dörre 和 Brigitte Aulenbacher 慷慨主編，探討 Michael 對社會學馬克思主義的投入，審視其理論的嚴謹性與實踐的相關性。這些文章借鑒

了他與兩個 Karl——Karl Marx 與 Karl Polanyi 的對話，在反思 Michael 知識影響力的同時，探討了勞動、剝削、市場基本教義派以及馬克思主義社會學的轉化潛能等問題。本部分收錄了 Nancy Fraser、Bob Jessop 和 Michelle Williams 等學者的文章，共同讚揚了 Michael 分析視野的深度與廣度，以及他連結批判理論與當代社會鬥爭的能力。

第二個主題脈絡聚焦於 Michael 在公共社會學和全球社會學方面的開創性成果。本部分的文章反思了社會學作為一種全球性志業所面臨的挑戰與可能性，強調社會學必須關注不平等、社會運動和跨國對話等急迫的議題。這些文章突顯了 Michael 在方法論上的創新，他對社會學參與公民社會的堅持，以及他對跨越各大洲——從歐洲到南美洲、亞洲和非洲——的學術辯論所產生的影響。總而言之，它們共同闡明了 Michael 的行動如何在動盪時期為理解世界提供了指南和框架。

第三條脈絡匯集了個人的見證與反思，強調 Michael 學術中的人本維度。透過相遇、辯論和實地考察的經歷，這些文章揭示了他在與學生、同事和行動者的關係中所展現的溫暖、指導和啟發。它們展示了他的行動如何在從南非到孟加拉的在地鬥爭中產生共鳴，以及它如何持續引導社會學家在批判性地思考社會的同時，堅守轉型行動的承諾。

Michael Burawoy 啟發了一種既嚴謹又致力於社會轉型的社會學願景。本期刊旨在慶祝他非凡的一生和成果，並重申我們對公共和全球社會學的集體承諾——一種不僅分析世界，而且尋求改變世界的社會學，播下新思想、新辯論和新行動的種子。在社會學家和社會學學科遭受攻擊的時代，重申 Michael 極力倡導的那種批判性社會學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重要。因此，本期刊也收錄了國際社會學會（ISA）於 2025 年 7 月 6 日在拉巴特第五屆 ISA 社會學論壇上發表的《社會學時刻宣言》。

我們希望這裡呈現的見解、反思和研究，能夠激勵全球的社會學家們推進一步勇敢、批判且具有轉化性的公共和全球社會學。■

Breno Bringel, Carolina Vestena 和 Vitória Gonzalez
《全球對話》的主編與助理編輯

> 《全球對話》以多種語言發佈於[官方網站](#)。

> 投稿請寄信至：globaldialogue@isa-sociology.org

> 編輯團隊

主編: Breno Bríngel.

助理編輯: Vitória Gonzalez, Carolina Vestena.

副編輯: Christopher Evans.

執行編輯: Lola Busuttil, August Bagà.

顧問: Brigitte Aulenbacher, Klaus Dörre.

區域編輯團隊

阿拉伯世界: (黎巴嫩) Sari Hanafi, (突尼西亞) Fatima Radhouani, Safouane Trabelsi, Siwar Harrabi.

阿根廷: Magdalena Lemus, Juan Parcio, Dante Marchissio.

孟加拉: Habibul Haque Khondker, Khairul Chowdhury, Bijoy Krishna Banik, Shaikh Mohammad Kais, Md. Abdur Rashid, Mohammed Jahirul Islam, Helal Uddin, Masudur Rahman, Raseel Hussain, Yasmin Sultana, Md. Shahidul Islam, Farheen Akter Bhuiyan, Sadia Binta Zaman, Md. Nasim Uddin, Ekramul Kabir Rana, Alamgir Kabir, Taslima Nasrin, Suraiya Akter, Ayesha Siddique Humaira, Nusanta Audri, S. Md. Shahin.

巴西: Fabrício Maciel, Andreza Galli, José Guirado Neto, Jéssica Mazzini Mendes, Carine Passos.

法國/西班牙: Lola Busuttil.

印度: Rashmi Jain, Manish Yadav.

印尼: Hari Nugroho, Fina Itriyati, Indera Ratna Irawati Pattinasarany, Nurul Aini, Lucia Ratih Kusumadewi, Rusfadia Saktiyanti Jahya, Ario Seto, Aditya Perdana Setiadi, Dominggus Elcid Li, Benedictus Hari Juliawan, Mohamad Shohibuddin, Gregorius Ragil Wibawanto, Hartmantyo Pradigto Utomo.

伊朗: Reyhaneh Javadi, Niayesh Dolati, Elham Shushtarizade, Ali Ragheb.

波蘭: Aleksandra Biernacka, Joanna Bednarek, Sebastian Sosnowski.

俄羅斯: Elena Zdravomyslova, Daria Kholodova.

台灣: 李宛儒, 周芸瑄, 郭志豪, 賴奕璋, 林韻柔, 呂道詠, 簡芊楹, 廖宇雯, 李妮

土耳其: Gül Çorbacıoğlu.

「一種結合全球與地方視角, 關於社會、 社會中與為社會而著的社會學」

由Klaus Dörre和 Brigitte Aulenbacher 編輯的「Michael 兩個 Karl」章節探討了Michael 與社會學馬克思主義的互動。



第二部分則聚焦於 Michael 在公共與全球社會學領域的開創性工作。



最後一部分收集個人的致敬辭與反思, 強調 Michael 學術中人文層面的觀點。

封面署名: Michael Burawoy, 聖彼得堡歐洲大學, 2015年。照片由Tatyana Lytkina拍攝。



Global Dialogue 由SAGE贊助

> 目錄

編輯的話：紀念 Michael Burawoy 特刊 2

> MICHAEL 和兩個 KARL

社會學馬克思主義：尚待完成的是什麼
Klaus Dörre, 德國 5

抗拒剝削與市場的基本教義派
Brigitte Aulenbacher、Roland Atzmüller、Fabienne
Décieux、Raphael Deindl、Karin Fischer 和 Johanna
Grubner, 奧地利 7

致敬 Michael Burawoy：一份感謝
Nancy Fraser, 美國 9

Burawoy 的公共社會學與注意力經濟
Ngai-Ling Sum 和 Bob Jessop, 英國 12

不受拘束的 Michael Burawoy
Heidi Gottfried, 美國 14

Michael Burawoy 的社會學馬克思主義之樹
Michelle Williams, 南非 16

> Michael、公共 與全球社會學

Michael Burawoy, 這個時代的社會學指南
Geoffrey Pleyers, 比利時 19

Michael Burawoy: 社會學作為一種志業
Nazanin Shahrokni, 伊朗／加拿大 21

Michael Burawoy:
在抵抗的馬克思主義與公共社會學之間
Ruy Braga, 巴西 24

Burawoy 與全球公共社會學的實踐：與俄羅斯的對話
Pavel Krotov, 美國、Tatyana Lytkina 和 Svetlana
Yaroshenko, 俄羅斯 27

Michael Burawoy: 公共社會學與意志的樂觀主義
Fareen Parvez, 美國 30

勞動過程與霸權生產：Burawoy 的貢獻
Aylin Topal, 土耳其 34

> 致敬辭

與 Michael Burawoy 的相遇與辯論
Ari Sitas, 南非 38

Michael Burawoy: 全球南方社會學者的燈塔
Shaikh Mohammad Kais, 孟加拉 40

紀念 Michael Burawoy: 一個探討南非小型巴士計程車產業
的馬克思視角
Siyabulela Fobosi, 南非 42

可行烏托邦的元素週期表
David Goldblatt, 英國 43

> 議題開講

屬於社會學的時刻
國際社會學會 45

「沒有 Burawoy 的公共社會學就像沒有翅膀的鳥。
但幸運的是，他教導了許多年輕社會學家如何飛翔。」

Labinot Kunushevi (科索沃)

> 社會學馬克思主義： 尚待完成的是什麼

Klaus Dörre, 耶拿大學榮譽教授, 德國

馬克思與Karl Polanyi是Michael Burawoy與他的好友Erik Olin Wright所共同發展的「社會學馬克思主義」(sociological Marxism)的兩大核心靈感來源。

> 馬克思主義：根系、主幹與旁枝

Burawoy將馬克思主義理解為一個生生不息的傳統；它根植於青年馬克思的歷史唯物論、人本主義，以及其對理論與實踐的特殊理解。從這些根部孕育而出的，是馬克思主義的巨大「樹幹」——在《資本論》中所展開的政治經濟學批判；而這又長出了許多枝條：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德國馬克思主義、凝固成教條的蘇聯馬克思主義，以及作為對這些發展的反動而興起的西方與第三世界馬克思主義。有些枝條枯萎，有些則繁盛；每一條枝幹都對應著Burawoy在其與Polanyi的批判性對話中所提出的三次市場化浪潮（第一次在十九世紀、第二次自1918年起、第三次自1970年代開始）。以Polanyi與馬克思並讀，是理解反思第三次浪潮的「社會學馬克思主義」之核心。

> Polanyi後的馬克思主義

Burawoy打破了傳統馬克思主義認為「對抗資本主義的力量必然產生於生產領域」的觀念。對Burawoy而言，生產領域恰恰是「對資本主義的同意」(consent)被生產出來的地方。由於全球「剩餘」勞動人口的存在，半受保護的就業狀態在工人眼中不再像剝削，而像是一份渴望得到的特權。主觀上來說，並非那仍然對資本累積不可或缺的剝削，而是「市場的撒旦工廠」(Satanic mill of the market, 用Polanyi的話)之經驗，形塑了人類千百樣的生命狀態。

> 社會學馬克思主義

在對傳統馬克思主義的重新思考上，Burawoy加入了更多關鍵理念。第一，社會學馬克思主義必須將「自然的商品化」(the commodification of nature)視

為第三次市場化浪潮的決定性特徵。因此Burawoy呼籲對市場施加限制，並使生產手段(the means of production)社會化，而這可能意味著擴張或限制某些基本自由。第二，第三波的馬克思主義將聚焦於超越市場與國家的民主公民社會。市場與國家並不會消失，但它們必須被置於民主的公民社會控制之下。第三，此種馬克思主義將公民社會理解為同時具有全球與國家兩重面向：一個為了捍衛人類免於迫近的生態災難而存在的公民社會，最終必須具有全球的維度。第四，這樣的馬克思主義能夠從廣受認可的市場批判著作中，汲取廣泛的社會學知識。第五，Burawoy透過尋找能促成公民社會進行「分子式轉變」的槓桿點，讓社會主義社會的想像得以延續——也就是對「真實烏托邦」(real utopias)的希望。第六，他在全球各地發現了萌芽中的生活替代形式，因而把社會學式馬克思主義發展為一種全球性的馬克思主義。第七，此種馬克思主義在方法上放棄了理論確定性與實踐必然性，以便在理論與實踐之間測試新的平衡點。

> 威權自由主義

透過他以社會學為基礎的社會主義構想，Burawoy留給我們一份必須承繼的遺產，以求讓未來仍然值得活下去。對我而言，有三項任務在此至為關鍵。其一，我們必須分析那些因自然與知識商品化，以及金融驅動的對勞動與貨幣的「土地掠奪」(Landnahme)所引發的新社會分化。

第三次的市場化浪潮已近尾聲，抵抗市場擴張的反運動越來越多是從威權國家與政府內部湧現。同時，民主公民社會在其多元性與自主性上也正日益受到威脅。我們正開始經歷第四波浪潮——依據第二波時期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Hermann Heller，這可稱為「威權自由主義」。這個術語指涉一種國家，它在經濟領域完全放棄自身權威，只承認市場的自由。今天，我們似乎正目睹這樣的反動：面對充滿衝突的社會—生態轉型，經濟正被從官僚羈絆中解放；而氣候保護——若仍被追求的話——則被交給市場力量與科技創新。新重商主義的貿易政策正終結以市場為驅動力的全球化；精英協議取代跨國外交；寡頭統治自內部掏空民主；一場原教旨主義的文化戰正清算基本人權。階

>>

「威權自由主義只有在政治體系制出現可信的替代方案時才能被擊敗」

級特權被鞏固，性別歧視與種族主義變成國家意識形態，而布拉沃伊曾賦予在對抗商品化中扮演核心角色的大學，如今正被國家暴政所箝制。這波新的商業化浪潮以社會關係為中心。既然稱說「已不再有足夠的資源讓所有人共享」，那麼唯有地球上最具生產力的居民才被認為擁有生存的權利；而他們所處的繁榮區域，則會以各種可行手段與那其餘易遭災難的世界部分隔離開來。

> 階級問題的復返

在一個充滿戰爭與災難的世界中，Burawoy留給我們的另一項重要任務，是他所提出的觀點：僅僅在舊體制的縫隙中尋求替代方案是不夠的。雖然自下而上的社會主義建構仍然重要，但也愈來愈清楚，新寡頭們的「威權自由主義」只能在整個政治體制內出現能夠贏得多數支持的可信替代方案時，才有可能被擊敗。因此，放棄爭奪國家權力將是失職的。為了抵抗理性不斷遭到摧毀，隱藏在市場邏輯背後的剝削與支配必須再度被公開揭露。Erik Olin Wright對一套整合性的階級理論的思考——不但將馬克思與Polanyi連結起來，也連結Weber、Bourdieu，更連結「黑人」與女性主義馬克思主義的思想聲音——在我看來，是這項工作至關重要的一環。

> 全球馬克思主義

無論人們如何看待這些主張，發展一種具有全球自我意識的社會學式馬克思主義，仍然是尚待實現的願景，也是我認為Burawoy遺產中第三項核心任務。隨著Michael驟然離世，我們正在見證一整個由（後）1968 運動在學術與政治上共同塑造起來的社會學家世代的逐漸凋零。當然，新一代仍在成長，而對我這個年紀的社會學家而言，支持並鼓勵所有以Michael的「社會學式馬克思主義」作為反思基礎的人，是值得從事的使命。我們能夠透過傾聽年輕世代來支持他們；透過批判那些自認掌握永恆真理的新「中央委員會」，以及批判那種將洞見依照時代風潮任意挑選、卻不面對受壓迫者日常社會苦難的馬克思主義「超市」式想法。總而言之，我們亟需尋找能促成交流的平台與形式，使Michael所構想的那個表演性理念得以實現：一種指引人們走向克服資本主義及其戰爭與災難之道路的全球馬克思主義。■

來信寄至：Klaus Dörre <klaus.doerre@uni-jena.de>

對這些反思有興趣的讀者，也可以參考由作者與學生及青年社會學家共同進行的「透過社會主義達致解放」計畫之成果，見：

<https://emasoc.de/sozialismus-von-unten-emanzipatorische-ansaeetze/>

> 抗拒剝削 與市場的基本教義派

Brigitte Aulenbacher、Roland Atzmüller、Fabienne Décieux、Raphael Deindl、
Karin Fischer 以及 Johanna Grubner，奧地利林茲大學

麥克·布洛維的社會學既是馬克思式的，也是波蘭尼式的，且遠不止於此。這篇文章將回顧他最令人印象深刻且最具啟發性的研究成果，並以其對二十一世紀市場資本主義的分析作為最終的總結。

> 麥克與卡爾·馬克思

麥克著作中的廣度與持續性很難用幾句話來概括：人們可能會迷失在他那些錯綜複雜的思想軌跡之中。難怪他將自己長年投入於勞動過程發展的研究形容為「[一個馬克思主義民族誌學家的奧德賽](#)」(Odyssey of a Marxist Ethnographer)，或將自己在(社會學的)馬克思主義更新中的角色理解為一名「行旅的通譯員」(travelling interpreter)。

麥克的理論視角展現出他對馬克思主義內部以及(古典)社會學內部的各種辯論的全面掌握。他對勞動過程的研究主要涉及幾個馬克思主義假設：資本主義的危機傾向性(crisis-prone nature)、階級鬥爭的重要性、統治階級霸權在工廠內和通過工廠運作的形成，以及革命性轉型的條件。然而，他對馬克思主義理論傳統的運用，從一開始就受到他對一些一般假設的批判性態度所引導。他對勞動過程的研究證明了，生產方式的結構性特徵總是以多樣且可變的方式被具體實現。這一洞見排除了任何理論概念的教條式套用，無論是在科學實踐還是在政治實踐中。他一以貫之的長期視角，要求我們正視並回應資本主義的變革性動態。

> 以卡爾·波蘭尼補充卡爾·馬克思

自1970年代以來，資本主義的根本轉變——即麥克診斷為「[第三波市場化](#)」(third wave of marketization)——與「現實社會主義」(real socialism)的終結，促使他將研究焦點轉移至社會與市場之間的關係。這一轉向構成了他對社會學的馬克思主義(sociological Marxism)的概念化基礎，並吸納了安東尼奧·葛蘭西與卡爾·

波蘭尼等多位思想家的洞見。對麥克而言，社會學的馬克思主義是跨國性的(transnational)，旨在於納入去殖民化(decolonization)與後殖民主義(postcolonialism)的經驗、說明父權制所造成的社會分裂，並承認社會鬥爭的多樣性以及後資本主義社會的多種潛在形態。

麥克那顆「為我們的時代」重新概念化馬克思主義之遺產的雄心，也建立在如下認識上：這一傳統必須拋棄對理論確定性的執著。相較之下真正需要的，是在批判性社會理論、科學與變革性社會實踐之間，展開一場平等主義式的對話(egalitarian dialogue)。

特別是自2008年的金融風暴以來，麥克愈加廣泛地借鑑卡爾·波蘭尼的經典之作《[鉅變](#)》(The Great Transformation)。在日本舉行的第十八屆社會學大會(XVIII World Congress of Sociology)上，他以主席演說《[面對一個不平等的世界](#)》闡述了他對波蘭尼的當代理解，並總結了公共社會學的各種爭議和辯論之成果，比如社會學在根本危機時期的任務。對社會學本身的反思，成為他以波蘭尼式視角分析當代市場的基本教義派(market fundamentalism)的核心環節，反之亦然；兩者最終導向他所謂的「波蘭尼式全球社會學」(Polanyian global sociology)：一種關於社會、立足於社會，並為社會而設的社會學。此一社會學與公民社會緊密相關並結合了全球與在地的雙重視角。

> 市場的基本教義派作為「活生生的體驗」

由於對許多國家的變革性變化有所洞察，麥克對波蘭尼的「鉅變」之解讀展現出相當的原創性。他令人印象深刻地將過去幾個世紀到當前的各種「運動」(movements)及「反向運動」(countermovements)的歷史學反思與社會學反思結合起來。在他關於市場的基本教義派的波蘭尼式理論中，最重要的部分在於結合了對三波市場化——在宏觀層面(macro-level)與中觀層面(meso-level)——的分

>>

「一種結合全球與地方視角, 關於社會、社會中與為社會而著的社會學」

析, 以及對市場化作為人們日常生活中「活生生的體驗」(the lived experience) 之分析。從歷史的視角出發, 麥克展示了市場的基本教義派對波蘭尼所說的「虛構的商品」(fictitious commodities) —— 土地/自然、勞動與金錢, 以及他進一步納入其中的知識 —— 的商品化 (commodification), 激發了以爭取勞動權、社會權及人權為形式的「反向運動」, 無論是基於階級的鬥爭, 還是對法律保障和制度性規範的訴求。

至關重要的是, 他對我們時代的「反向運動」的看法使我們能夠理解, 日常生活的經驗刺激了各種形式的社會抗議。在市場的基本教義派的時代中, 不僅是商品化, 包括去商品化 (decommodification)、排除商品化 (excommodification) 以及再商品化 (recommodification) 的過程都能導致根本性的問題, 特別是對於那些因失業而被排除在市場交易之外的人, 或在面對無利可圖、因而被忽視的生態問題時, 更是如此。並非對公民社會的浪漫化 —— 特別是在右翼民粹主義日益高漲的當下 ——, 二十一世紀初的勞工與社會運動的廣泛行動空間 (latitude) 為麥克展現了各種波蘭尼式的「反向運動」, 而這正是資本主義持續變革過程中的核心動力。

> 麥克關於且為社會運動所著的社會學

以波蘭尼的分析為基礎, 麥克主張商品化已是我們這個時代決定性的經驗。雖然剝削仍是資本主義批判的基本概念, 但人們往往並未有意識地就其本身來知覺它 —— 此乃麥克在《製造甘願》(Manufacturing Consent) 一書中發展的洞見。在其「一般理論」中, 三波市場化並沒有被孤立地看待, 而是被理解為在一種辯證的 (dialectical) —— 也許甚至是逆行的 (regressive) —— 動態中相互連結。

麥克預計自然的商品化將在現階段發揮主導作用。他強調一種有效的反向運動必須以全球規模生成, 只有在那樣的層級上, 對自然的破壞以及金融的全球操弄 (global machinations) 才能受到有意義的質疑。而這樣一種反向運動必須克服根深蒂固的地緣政治邊界、國家制約因素以及由市場化所設計的短期邏輯。

面對天真的樂觀主義, 麥克主張一種不妥協的悲觀主義。他借鑑了波蘭尼和馬克思, 將波蘭尼虛構商品及反向運動的概念與馬克思對資本主義動態的分析進行了結合。只有透過仔細檢查推動市場化的物質力量, 我們才能開始評估當代社會運動是否 —— 有意或無意地 —— 助長或扭轉其強化。

> 懷念麥克

我們多年來熟悉麥克的社會學, 如今我們回顧著與他長期而豐富的合作。我們感謝他給予我們無數次見面的機會, 讓我們得以受益於他的研究、思想交換及合作, 也感謝他那份知性的慷慨、學術投入以及激勵性的幽默感。作為本校奧地利林茲大學的訪問教授, 麥克啟發了奧地利國際卡爾·波蘭尼學會 (International Karl Polanyi Society) 的創立。作為《全球對話》(Global Dialogue) 的創辦人, 他邀請我們為這份傑出的刊物撰稿。有太多話來不及說 —— 我們這個時代的一位卓越思想家已然離去。我們深切地懷念他。 ■

來信寄至: Brigitte Aulenbacher <brigitte.aulenbacher@jku.at>

> 致敬Michael Burawoy： 一份感謝

Nancy Fraser, 美國社會研究新學院

麥克·布洛維 (Michael Burawoy) 悲慘而無謂的死亡，使我們所有人都感到震撼和驚慌。對我而言，這個消息也帶來了錯失機會的遺憾。我長久以來欣賞麥克的知性才華、政治委身以及親切為人。可我卻浪費了與他發展更長遠關係的機會。事實上，我們僅有過零星的接觸：第一次是在1990年代中期於西北大學 (Northwestern University)，當時他作為訪問教授到來，而我正準備離開轉往新學院任職；後來，在一系列的學術會議和研討班中，我們針對馬克思 (Marx) 和波蘭尼 (Polanyi)、葛蘭西 (Gramsci) 以及杜波依斯 (Du Bois) 進行了討論，嘗試釐清民主社會主義變革的前景。這些會議本身都成果豐碩，也孕育了一些未來的可能性。在西北大學時，麥克曾於我人生一個艱難而關鍵的時刻挺身相助——那是一種出於無私與自發慷慨的行動。而在那些學術會議上，他與我展開精彩而熱烈的辯論，推動我以更深刻、更具批判性的方式思考。直到如今，面對他的離去，我才深切體會他對我而言有多重要。也惟有此刻，我才真切感受到自己錯過了與他展開更長久對話的遺憾。

> 共同的啟發

無疑地，我與麥克之間有許多值得討論的共同之處。誠然，他是一位英國出身的社會學家，曾在三大洲研究勞動體制，而我則是相對地方性的美國哲學家。然而，我們兩人同為嬰兒潮世代 (baby boomers)，也同樣是新左派 (New Leftist)，並且在那段全球解放運動高漲的非凡時刻找到了自己的聲音。正是出於這樣的經驗，我們立下了共同的志業，即發展出一個適合於「後共產主義」(postcommunist) 時代的馬克思主義，將過去社會主義變形的慘痛教訓，與那些來自新社會運動中雖尚未充分發展卻不可或缺的洞見整合起來。然而，如今使我最深受觸動的，是我們最終都從許多相同的思想家那裡汲取養分，作為磨礪思想的資糧。

Karl Polanyi 是最主要的。從他身上，我和麥克都看到了一個能夠對馬克思思想進行補充和豐富的思想

家。我們沒有被那種把「兩個卡爾」(the two Karls) 視作彼此對立的見解所說服，而是各自發展出對《鉅變》(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的解讀，使其為對資本主義危機和社會鬥爭的一種延伸且跨馬克思主義 (trans-Marxian) 的理解。

> 理解資本主義社會鬥爭的新方式

我們兩人都認為，波蘭尼對土地、勞動及金錢之虛構商品化 (fictitious commodification) 的論述，揭示出資本主義社會中生態危機、社會再生產危機以及金融危機——雖然前兩者與「經濟」有一段距離——的結構性根源。但麥克對這論點的表述非常厲害，呈現出一個既非本質主義、又深具馬克思精神的波蘭尼。以布洛維的話來說，虛構商品化將土地、勞動和金錢都化約為交換價值，從而摧毀了其使用價值，包括作為真實商品市場的可能性條件。

同樣地，對我們來說，波蘭尼提出的「雙重運動」(double movement) 概念——將市場擴張的推動者與試圖保護社會免於其影響的擁護者對立起來——啟發了一種理解資本主義社會中鬥爭的新方式。這些遠離生產領域的鬥爭，即是我所謂的「邊界鬥爭」(boundaries struggles)，其所爭奪的並非剩餘價值的分配，而是生命的語法 (grammar of life) 與社會制度的設計。對我和麥克而言，波蘭尼的思想範型正好成為克服經濟主義 (economism) 的契機，使反資本主義行動的場域與形式得以倍增，並超出古典馬克思主義所關注的核心範圍。

> 分歧的詮釋：懷疑 vs 力量與應許

然而，我們之間存在一個關鍵的分歧。那就是我對波蘭尼援引「社會」一舉深感懷疑，我認為他的援引是本質主義式的，且模糊了非基於市場 (non-market-based) 的統治形式；而麥克則積極地將之理解為「活躍的社會」(active society)。波蘭尼式的社會是在資本主義發展中被召喚出來，因此具有歷史特定性

「自由派菁英顯然缺乏意願去捍衛曾經賦予他們權力的體制」

(historically specific)的社會，這對麥克來說是充滿動態活力的。隨著行動主義的諸能量之爆發，預示了一種新的社會主義形式，在其中，假定為自行調節的市場將會屈從於一個真正地自行調節的社會。如今，在重讀了他那篇寫於2003年的出色文章〈關於一個社會學的馬克思主義〉(“For A Sociological Marxism”)，我才終於領會到麥克詮釋中的那種力量與應許。

> 透過葛蘭西來達成匯合

眾所周知的是，那篇文章在將波蘭尼與葛蘭西聚合起來，後者是我與麥克共有的第二個主要參照點。這位義大利人，同樣假設了社會作為發達的資本主義的中心。然而，與波蘭尼不同的是，葛蘭西辯證地理論化了「公民社會」：作為階級競爭的場所，同時作為對這一競爭的約束。在發達的資本主義社會中，公民社會是一個在經濟與國家之間的調節空間(intermediating space)，其中包含了學校與教會、法庭與福利機構、大學與研究中心、工會與專業協會、媒體與博物館。正是在這一領域中，公共輿論與日常理解得以形塑並流傳，布爾喬亞的常識在此將顯得是具霸權性的，而受統治者對階級統治的同意是(或多或少)被贏得的。但這不是全部。公民社會還作為一個競爭的空間，在其中，同意是會耗損的，而一種反霸權(counterhegemony)原則上能夠被建構。作為一個同時是遏止又是競爭的地勢，公民社會既表明了政治相對於經濟的自主性，也表明了政治對各種特定的制度矩陣(institutional matrices)、階級結構的力場和歷史的關頭的嵌入性(embeddedness)。對麥克和我來說，這種看法是基本的。我們都廣泛利用了各種葛蘭西式的概念，包括公民社會、擴展的(或整合的)國家、歷史集團(historic bloc)、權威危機、空位時代(interregnum)、被動革命、屬下階層(subalternity)、霸權與反霸權、常識(common sense)與良識(good sense)、陣地戰(war of position)與運動戰(war of movement)、福特主義(Fordism)與「美國主義」(Americanism)。

麥克是因我一篇早期文章中對葛蘭西的這些概念的使用而與我進行初次聯繫。我主要依憑直覺，半有意識地運用了葛蘭西式的語彙(tropes)來分析晚期社會民主、福利國家資本主義中的「需求鬥爭」(struggles over needs)。在具有歷史特定性的「社會」領域中——原本被視為「私人」的事務在此成為了爭論的對象——展開的這些鬥爭，所爭執的不僅是需求的滿足，還包括對需求的詮釋以及在國家代理之內，使這些需求得以被滿足與被馴化的治理術(governmentality)之形式。這些同樣是邊界的鬥爭，但與波蘭尼所認為的相反，它們構成了一種「三

重運動」(triple movement)，其中涉及的不再是兩組，而是三組對抗者：其一是激進的社運人士，為那些「失控的」需求之公共政治性質而奮鬥，並主張以參與式民主的方式來部署它們；其二是保守派，他們試圖將這些需求重新驅回家庭與市場的封閉空間，使它們再次被去政治化(depolticalized)；其三是進步的自由派技術官僚，他們致力於將這些需求翻譯成行政語言，並以官僚的方式加以滿足。麥克比我更早也更深刻地理解到，這一分析多大程度有賴於葛蘭西的思想。他在2003年對這項研究的討論啟發我在研究所課程中展開了對《獄中札記》(The Prison Notebooks)的系統性研究。對此我將永懷感激。

> 當霸權統治是一種強行而非合意

麥克也了解到，葛蘭西的思想能有多少貢獻，特別是在一個更灰暗的歷史關頭。在一個被川普主義(Trumpism)及其橫跨世界的類似物(analogues)所主導的時代，回顧那位偉大的義大利共產主義者所做的對比——霸權統治在一個發達的自由民主社會中的「正常」運作，及其在法西斯主義中病態的政治下放(political devolution)之間——是很有幫助的。霸權統治在一個發達的自由民主社會中的「正常」運作，及其在法西斯主義中病態的政治下放(political devolution)之間的對比。麥克對葛蘭西之主張的評註是一個很好的模範。透過闡明葛蘭西關於霸權統治作為同意(consent)和力量(force)的平衡混合物(balanced amalgam)之概念，麥克提醒我們，對葛蘭西來說，資本主義國家在其非病態形式中，就「只是外壕(outer ditch)」，而其背後那個強大的堡壘和防衛工程系統，則是公民社會。只要該「系統」對統治階級賦予同意，它就減少對直接力量的需要和能見度。

當然，如今那些堡壘和保衛工程正遭受著襲擊——而且不是來自左派。至少在美國，所謂「MAGA國家」正在系統地吞併自由民主公民社會的核心機構，撕裂教育、科研與文化體系，還有私營企業、NGO以及專業協會的自主性。通過瓦解布爾喬亞社會產生同意的「正常」管道，霸權的平衡被轉向了對力量的依賴。這種力量如今作為殘忍的現實與逼近的威脅，其能見度愈發清晰。警務軍事化、抗議被鎮壓、移民被蒙年男子給擄走並驅逐出境。恐懼瀰漫於整片土地。如果這顯露了法西斯主義的端倪，那它預示著的是一種新型的法西斯主義，後者召喚出的可怕幽靈，並非現實的社會主義運動，而是一個與新自由主義結盟並獲得了少數工人階級的支持的「覺醒左派」(woke Left)。

>>

> 如何對抗原型(proto-)法西斯主義:調動布洛維的洞見

在這樣的局勢下,有效的對抗力量應該以何為中心?當然,不會是在自由主義精英之中。那個階層的領導人物非但沒有發起協調一致、具戰鬥性的公民社會自我防衛行動,反而放棄了任何關於集體行動的想法,並急於追求個人的利益協議。顯而易見的,他們缺乏捍衛那曾經使他們得以獲權的體系的意志。如果有效的對抗力量出現,它將來自別處。

這樣一種對抗會來自下層嗎?是否有可能出現一種由屬下階層(subaltern)領導的歷史集團,足以對(原型)法西斯主義提出可信賴的反抗?可以推測,這樣一個集團的主要目標並不在於恢復那種力量與同意的「非病態的」平衡,這種平衡「通常」強化了布爾喬亞權威並支撐著資本主義的階級統治;相反地,它的目標將是克服這樣的權威和統治。然而,為了這樣的集團得以形成,屬下階層的主體必須克服當前彼此間那種有害的錯認(misrecognition)之鴻溝,尤其是種族的鴻溝。這樣的過程,還是可設想的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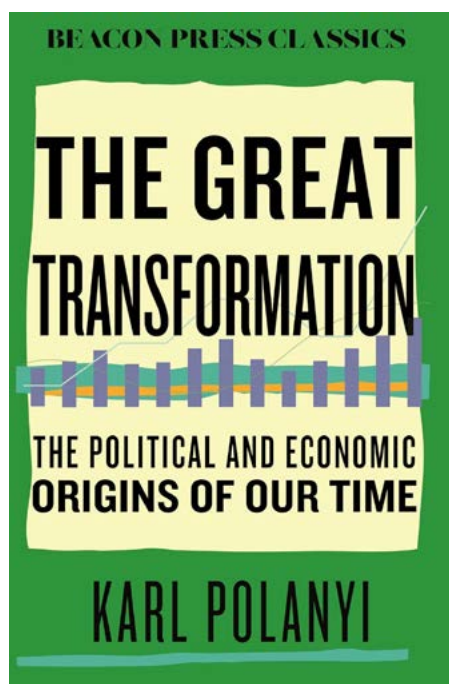
麥克對此會有許多想說的。但他的聲音已然沈寂,這對左派來說是何等沈痛的損失。然而幸運的是,他為我們留下了一座嚴謹並具想像力的思想寶庫,是我們能夠借鑑的。對於這位才華卓絕並極具人性光輝的思想家,絕佳的致敬莫過於去調動他的各種洞見,來澄清當前的解放前景。■

來信寄至: Nancy Fraser <frasern@newschool.edu>

譯註:「MAGA」是「Make America Great Again」的縮寫,意即「讓美國再次偉大」。此口號最早由 1980 年代的美國總統雷根在競選時提出,後來被川普重新採用,並發展為其政治運動的核心象徵,成為川普主義的標誌。

> Burawoy 的公共社會學 與注意力經濟

Ngai-Ling Sum、Bob Jessop，蘭卡斯特大學，英國



Karl Polanyi的《偉大轉型》(Beacon Press, 2025年版)以及 Erik Olin Wright的《想像真正的烏托邦》(Verso Books, 2010年)。

這篇文章旨在向Michael Burawoy致敬，回顧他富有創見且具影響力的「公共社會學」理念，並探討這一理念如何進一步回應「注意力經濟 (attention economy)」與「後真相 (post-truth)」的川普時代。在理論上，Burawoy區分 Karl Marx 與 Karl Polanyi 的觀點，並嘗試加以綜合與延伸；特別是，在探討資本主義、商品化、剝削與不平等時，Burawoy討論到市場化的三個階段。

> Burawoy、Marx與Polanyi

Burawoy認為，Marx主要在研究生產過程中資本主義的剝削，這是在第一波市場化中的討論焦點。而Polanyi則是探討市場關係中的商品化，並分析第一與第二波的市場化；他指出勞動力、土地與貨幣等「虛構商品」的存在起先並非為了販售，但它們被賦予價格並市場化，進而導致「自我調節市場」的失靈，迫使社會必須介入、加以規範，以維持這些商品的使用價值。Burawoy進一步將Polanyi的分析延伸至 1980 年代以來的新自由主義，視其為第三波市場化的開端。這一階段的特徵是自然與知識的商品化：自然被轉化為可交易資源，導致環境破壞；知識則透過智慧財產權與高等教育體制被納入市場體系。

這種將Marx與Polanyi綜理解的理論取向，在 2022 年Burawoy的晚期著作中仍持續發展。他借鑑了Erik Olin Wright關於「真實烏托邦」的理論與實證研究，主張這些烏托邦並非要廢除市場或國家，而是要透過集體自我組織，讓社會重新回歸社會主義的軌道；也呈現了反向運動 (countermovements) 如何抵抗各種形式的商品化。例如，維基百科 (Wikipedia) 即是一個抵抗知識商品化的案例。Burawoy的社會學式馬克思主義認為，公共社會學是探討虛構商品化並理解社會如何回應的最佳切入點。

> 注意力經濟與川普時期的後真相時代

在他於 2025 年辭世前的最後一次訪談中，Burawoy特別強調川普時代的重要性。他認為這可以被視為第三波市場化的最新階段，尤其體現在「注意力的商品化」上。在此階段，藉由社群媒體中娛樂導向的遊戲化機制——如線上測驗、與網紅合作、虛擬貨幣、積分制度與社交互動，並伴隨誇張的話語和影像，以建立對使用者行為數據的分析。這些誘導機制讓使用者持續投入，並受困於注意力經濟之中。從批判的觀點來看，人類的注意力因此

>>

成為一種可以被商品化並創造交換價值的稀缺資源。企業競相吸引、捕捉、篩選並貨幣化數據與注意力。注意力商品化的現象主要是由矽谷的社群媒體巨頭主導，例如 Meta 的祖克柏。這些企業在平台上蒐集並整理數據、在資料中心匯集，並掌握演算法設計與遊戲化／說服性技術的關鍵，讓人們的注意力持續停留在他們的網站上。他們同時提供使用者各種媒體或社會經濟產品（如：數位贈品、影片、新聞訊息、社交功能），以吸引用戶、影響他們的觀點，甚至可能塑造特定的經濟與政治影響。

在此脈絡下，人的注意力便具有交換價值，因為它既是一種資源，也是一種貨幣。作為資源，它能推動銷售並形塑影響力；作為貨幣，使用者的認知、情感與心理注意力可被換作特定的禮物或網路服務（例如線上活動門票、社交互動、搜尋結果），但同時，這也將部分的注意力控制權（例如暴露於廣告與政治「速食」貼文中）讓給網紅（influencers）與注意力商人（attention merchants）。他們透過將注意力控制權轉售給廣告商以獲取交換價值；廣告商會依據獲得注意力的程度（例如觀看時間與深度）支付費用。同樣地，網紅透過 Instagram、TikTok、推特等訊息吸引觀眾注意，並試著從相應的經濟與政治影響力中獲取利潤。

注意力經濟也正在重塑政治與社會。川普正是後真相時代中「追求注意力的名人政治家」典型，他打造了「川普品牌」並在政治場域中運用它。他藉由社群媒體（如：福斯新聞、推特、Truth Social）的演算法進行篩選，並透過「回音室效應」吸引具有相近政治立場的群體。透過誇張地嘲諷對手、煽動群眾的口號與標語（如「讓美國再次偉大」），迅速地動員出以民粹為基礎的情感，喚起選民內心的希望、恐懼或焦慮等情緒。在川普簡化的迷因與戲劇性的論述下，其他政治人物只能選擇被動地回應，進而讓川普得以主導論述的、情感的與政治的場域。這種在注意力時代下重新形塑的政治溝通形式，不僅影響「個人—社會」層面的認知與情緒，社會亦沿著新的分歧線日趨極化。

> Burawoy 的公共社會學與後學科化的知識實踐

回應 Burawoy 對公共社會學的號召，這些新的社會現況為反向運動提供肥沃的實踐場域，在「後真相注意力經濟」的第三波市場化時代中進行全球規模的抵抗。在此，「真實烏托邦」成為 Marx 與 Polanyi 之間的連結，提供了抵抗「認知與注意力商品化」的草根行動，即便它們不全是以全球規模進行。此類案例包括：追求平台去中心化的注意力行動主義（attention activism），以及地方層次的「數位排毒注意力庇護所」（attention sanctuaries of digital detox），兩者皆可與跨國運動串聯。除了地理規模上的討論，注意力商品化也同時涉及微觀與宏觀層面：在微觀層面涉及人的認知、感受與情緒；在宏觀制度面中，透過掌握行為資訊，注意力的運算邏輯可被視作資源、貨幣與操弄手段。

這些變遷可能需要我們延伸出比以往更多的社會學的想像。反向運動的相關公眾可能必須重新動員公共、政策、批判與專業社會學；同時，藉由後學科化的方式，結合多元領域以提升學術與公共知識。這意味著要超越傳統社會學，並關注不同學科的主張及其與社會學的關聯性，包括批判心理學、教育研究、計算科學、媒體研究、敘事分析、非正統經濟學與（國際）政治經濟學。終其目標在於，面對這股將人類認知與注意力商品化的「超級市場化浪潮」，以提升對「真實烏托邦」的認識論反思；並且，在不同尺度和場域中，促進反向運動在制度性與能動性上的表現。■

來信寄至：

Ngai-Ling Sum <n.sum@lancaster.ac.uk>

Bob Jessop <b.jessop@lancaster.ac.uk>

> 不受拘束的 Michael Burawoy

Heidi Gottfried, 韋恩州立大學, 美國

Burawoy在威斯康辛大學開設的民族誌研究所課程，是我最初研究嘗試的啟發——在〈[「彈性」作為臨時服務業的調節模式](#)〉這項研究中，我試圖整合女性主義與葛蘭西式馬克思主義的微觀基礎。他的啟發不僅止於理論層面，還實際支持了我第一次的田野民族誌嘗試。當時他在家工作，親自擔任我的「派遣員」，將臨時人力公司的工作任務轉交給我。因此，我對這期刊的貢獻，不僅出於學術上的批判對話，也源自於和他的私人情誼。我將呈現他在勞動研究的譜系，如何從葛蘭西的《獄中札記》，延展到後來與波蘭尼的思想對話。

> 民族誌的轉向

要回顧這些努力，很適合引用Burawoy在《製造甘願》二十週年研討會上對Donald Roy（這位「社會學家兼勞工」）的反思。他不遜地開場說道：「我們應該讓先賢再現，倘若只是把他們供奉起來，將他們凝固於歷史，便會錯失他們對當前世界的真正意義。」他在那篇文章中的先見之明的結語，恰如其分地描繪了Burawoy這位導師、行動者與學者的特質：「他最初是研究工業勞動的社會學家，但最終將他的見解帶回了家鄉，探索社會學工作的新路徑。」

Burawoy留給後人的東西不僅止於理論貢獻。他結合芝加哥學派對日常生活的深描個案研究，與西方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傳統，使《製造甘願》成為馬克思主意出現民族誌轉向的重要先驅。在後來的《Global Ethnography》與《Ethnography Unbound》中，他與合著者將民族誌的藝術實踐植根於不同的地方歷史——從匈牙利的社會福利辦公室、舊金山街頭的無家者、愛爾蘭的軟體工程師，到從印度喀拉拉遷移至美國科羅拉多中心城的護理人員。女性主義社會學家也運用Burawoy的微觀政治視角，進行許多開創性的研究，如：情緒勞動的研究，以及在工廠、辦公室與服務業互動中（再）生產的陽剛氣質與女性氣質研究。

《Global Ethnography》與《Ethnography Unbound》都是芝加哥學派與曼徹斯特大學的學術系譜中的關鍵一環。《Global Ethnography》重新思考「田野」的意涵：以民族誌作為全球性研究的方法時看似矛盾，因為它原本是為研究地方而設計的，本書

的觀點從而使民族誌擺脫了單一時間和地點的限制。Burawoy接著帶領讀者展開一場眩目的理論巡禮，遍歷Jameson、Castells、Harvey與Giddens等學者，尋找一個足以描述全球化的理論框架。在此過程中，他梳理出這些理論間的共通主題，從而透過位移（displacement）、壓縮（compression）、時空延展（distanciation）和消解（dissolution），將全球化體現為對時間和空間的重新組合。Burawoy進而從這些主題片段中拼湊出一套全球民族誌的理論。

> 社會學的馬克思主義(們)

Burawoy以他那好學不倦的求知熱情，深入研究了主要社會理論家的生平著作，使社會學式的馬克思主義在我們這個時代重新煥發活力。〈[A Tale of Two Marxisms](#)〉這篇文章延續了他在比較葛蘭西與波蘭尼時所開展的主題。兩人雖然都致力於回應特定歷史情境中浮現的矛盾與異常，但若進一步探掘，便可看出他們的關注重點與理論限制各不相同。Burawoy在此引入西蒙·波娃與南希·傅瑞瑟（Nancy Fraser）作為理論對話的主角，指出一個他自己也未能完全克服的理論缺口：他批評葛蘭西與波蘭尼在理解其社會的政治時，都忽略了家庭內部的組織結構。葛蘭西在〈Americanism and Fordism〉中，將「一夫一妻制家庭」的功能與福特式生產管理相聯繫；波蘭尼則視家庭為抵禦市場破壞與勞動商品化的潛在防線。然而，Burawoy的女性主義理論止步於家庭門檻之外，因為他對性別結構與階級關係之間的理論理解仍顯薄弱。

> 女性主義的轉向

在Burawoy的啟發下，更具力量的女性主義政治經濟學從微觀基礎出發，進一步推展至宏觀結構，將照護工作的新自由化進程加以理論化。透過女性主義視角重新思考波蘭尼的理論，會發現再生產勞動可以被視為是一種虛構商品，也是對照護工作市場化的一場反運動。照護工作在許多領域中早已被市場所吸納。親密關係的日益商品化，使更多日常生活與社會關係被捲入資本運作的循環之中。資本主義的再生產結合了有酬（商品化）與無酬（非商品化）的再生產勞動，作為維繫生活持續的過程。無酬的家務勞動只是家庭生產的一項投入，同時仍須依賴以有酬勞動所得去購買的商品——兩者皆為資本主義下家庭生存的必要條件。然而，資本企圖從商品化的再生

「為我們時代帶來的社會學馬克思主義新觀點」

產活動中獲利的意圖，與非商品化勞動在支撐父權化、種族化的資本社會關係所發揮的補償性作用之間，存在著根本的矛盾。階級差異（交織著性別與移民身分）正是商品化與非商品化家庭照護勞動的核心動力。再生產活動的私有化與商品化，其形態深植於階級結構之中，而階級又常與種族劃界重疊。低收入家庭倚賴非正式、非商品化的勞動；高收入家庭則能購買市場化服務，並更直接地從稅收減免與現金補貼中獲益——但這往往意味著更高度的商品化。在這樣的歷史關口，反霸權運動正重新構想照護勞動與再生產勞動的社會組織方式。

> 持續的遺緒

這篇簡短的知識傳記，置身於與Burawoy相似的政治環境——同樣被威權幽靈所籠罩的時代。Burawoy那經由葛蘭西、波蘭尼與女性主義視角所折射的科學馬克思主義，呼籲我們以批判的取徑，「真實地」去追尋他與摯友Erik Olin Wright共同想像的真實烏托邦。無論是在尚比亞的銅帶區、芝加哥的機械工廠，還是在他晚年呼籲社會學家為巴勒斯坦發聲的倡議中，都可見他一以貫之的信念：唯有透過歷史性的書寫，揭示過去曲折事件之間的連結，才能照亮通往未來的可能道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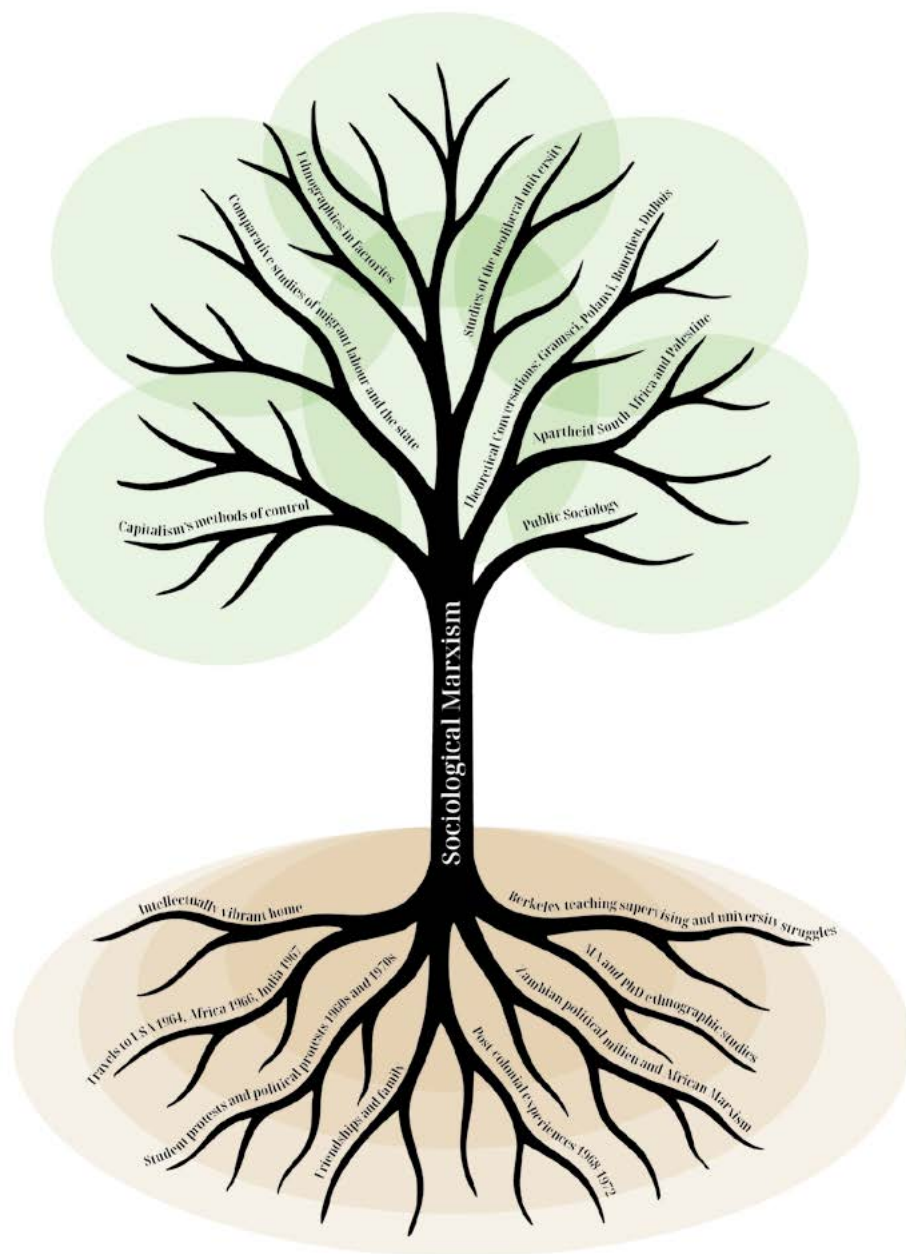
來信寄至：

Heidi Gottfried <Heidi.gottfried@wayne.edu>

> Michael Burawoy的 社會學馬克思主義之樹

Michelle Williams, 金山大學, 南非

Burawoy的《社會學馬克思主義之樹》。圖片
來源: Michelle Williams。



Michael Burawoy 這位精神不輟、智慧非凡的學者，他在加州奧克蘭遭遇了一場肇事逃逸的冷酷暴力事件，並於 2025 年 2 月 3 日離世。1995 至 2005 年間，Michael 是我碩士與博士學位的指導教授。即使在我離開柏克萊前往南非後，他仍定期前來造訪。多年來我們成為至交摯友，他對我的教誨與指導也時終不曾間斷。他既是我最嚴厲的批評者，也是我最堅定的盟友。

儘管我嘗試在此梳理 Michael 畢生對社會學與馬克思主義的貢獻，但這份文字無疑存有偏頗——它更多地反映了一位學生和朋友對恩師的片面追憶，畢竟我從他身上所獲良多，難以盡述。Michael 總能在我提交的任何文稿中找到可精進之處，我想這篇作品也必然不例外——但我真心希望，他能對我所描繪的「Burawoy 社會學馬克思主義之樹」感到一絲會心與莞爾。



> 理論的根基

Michael Burawoy 是一位罕見的學者。他畢生堅定不移地投身於社會學與馬克思主義，以其過人的智慧深入鑽研這兩個領域，並找到了極富成效和創新性的結合方式。他對兩者的承諾，部分源於其個人經歷——Burawoy 是透過親身經歷接觸社會學和馬克思主義的，這些經歷深深烙印在他的正義感和對社會世界的好奇心中。他的父母是俄羅斯猶太人，於 1920 年代從俄羅斯遷居德國並獲得化學博士學位，但隨著希特勒崛起，他們又在 1930 年代離開德國前往英國。他的家庭是一個充滿智識活力且具有政治熱忱的環境。1964 年夏天，十七歲的 Burawoy 搭乘挪威貨船橫渡大西洋，並在美國各地為紐約書商推銷書籍，就這樣度過了一個暑假。當時的美國正處於社會能量爆發的時期，自由言論運動、民權運動、反越戰抗議和城市反抗行動風起雲湧。這次旅程在他心中埋下了社會學想像的種子，並在接下來幾年他搭乘三等火車遊歷印度、以及搭便車橫越非洲的經歷中，找到了堅實的立足點。

Burawoy 從劍橋大學數學系畢業後，先是在南非約翰尼斯堡擔任了六個月的記者；隨後轉往剛獨立的尚比亞，在一間經營銅礦開採的大型跨國公司人事部門任職。如同他在 1964 年夏天在美國感受到的社會活力，當時的南部非洲正因反對種族隔離和反殖民鬥爭的政治熱潮而激昂。正是在尚比亞，Burawoy 接觸了馬克思主義、後殖民動力以及階級與種族的交織。他的社會學與馬克思主義之旅在他於尚比亞大學註冊社會學碩士學位時正式確立。這個僅有三名成員的社會學系，讓他深入瞭解了馬克思主義、延伸個案法、民族誌，以及種族、階級與種姓之間的複雜關係。在此過程中，他體會到社會學和社會理論在理解世界上的巨大力量，對社會學的熱愛也從此奠定！對 Burawoy 而言，社會學與馬克思主義的結合，提供了理解世界和奠定改造世界、使其變得更好的強大工具。確實，正是透過他個人探索世界的旅程，發展出他對社會學和馬克思主義堅定不移的忠誠。他讓社會學與馬克思主義展開對話，開創了社會學馬克思主義的新領域——這是一種非教條式的馬克思主義，它將社會與國家和經濟並置。他從未偏離這一學術航道，對於學術界中常見的浮誇修辭姿態也從不假以辭色。

在接下來的五十年間，Burawoy 成為他那一代最重要的社會學家之一。他身兼多重身份：一位傳奇教師、一位盡職盡責的指導者、一位充滿同理心的朋友與同事、一位非教條式的馬克思主義者，以及一位卓越非凡的學者。

> 理論的主幹

Burawoy 是一位熱情洋溢、甚至是充滿布道精神的社會學家，以及一位才華橫溢的馬克思主義者，他畢生都為解放性的未來 (emancipatory futures) 的疑問與渴望所驅動。他認為社會學的職責是讓不可見的現象變得可見，而馬克思主義的角色則是提供理解不可見現象背後社會力量的工具。Burawoy 的創新之處在於，他總是

能以不尋常的方式提出尋常的問題。舉例來說，當他在尚比亞銅礦場工作時，他沒有著眼於工人如何回應殖民主治的結束，而是將焦點轉向管理階層如何回應，這使得他揭示了「向上流動的種族壁壘」(upward moving color bar) ——即隨著非洲人進入管理層，種族歧視的壁壘也隨之升級。他這種不尋常方法的另一個例子是：在他對芝加哥工廠的民族誌研究中，他沒有去尋找車間裡工人反抗的跡象，而是轉而探究「工人為何如此努力工作」，試圖更深入地理解資本主義及其控制方法。

Burawoy 深知，只要資本主義存在，馬克思主義就必然存在。如同資本主義隨著時間演進一樣，馬克思主義也必須重塑自我，以反映時代的根本問題。對 Burawoy 而言，這種重塑具體體現在他的社會學馬克思主義之中。借鑒 Gramsci 和 Polanyi 的思想，Burawoy 的馬克思主義著眼於歷史特定的社會觀念，藉此理解資本主義經久不衰的原因，以及在資本主義之外實現希望的可能性空間。他的民族誌方法揭示了資本主義的微觀基礎，而他的延伸個案法則將這些微觀過程的研究提升至宏觀社會學的層面進行闡發。藉由這種結合，他為馬克思主義帶來了歷史特定的視角，有助於闡釋一個動態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傳統；同時，他為社會學引入了一種在尚比亞錘鍊而成的人類學方法，凸顯微觀社會學研究對於社會理論的重要性。對 Burawoy 來說，理解「社會」及其在資本主義中的作用，是社會學與馬克思主義兩者的關鍵所在。在他 2003 年的論文《社會學馬克思主義》中，他解釋「社會」棲居於經濟與國家之間的制度性空間。他借鑒了 Gramsci 對滲透國家的公民社會的理解，以及 Polanyi 對遍及市場的「積極社會」的論述，並主張社會主義認為市場和國家必須服從於社會。

> 理論的枝幹

Burawoy 首先透過他對勞動體制和工作場所民族誌的研究重塑馬克思主義，隨後轉向公民社會以及在晚進資本主義中產生的各種運動。這一轉變標誌著他將超越資本主義的關鍵，從工人階級和生產地點轉移到公民社會。Burawoy 在社會學馬克思主義的第一階段中，將重點聚焦於工作場所，同時結合了其延伸個案研究法的民族誌方法。透過與工人們一同在工廠車間工作，他觀察到資本主義是如何在生產現場持續適應變遷情境的同時，亦能獲取勞動者的認同。Burawoy 透過對尚比亞銅礦場、加州和南部非洲的移工、以及芝加哥和匈牙利工廠的一系列工作場所的比較研究，發展出一個「活生生的」馬克思主義。這個學說幫助人們透過生產車間的微觀基礎，來闡明資本主義不斷演變的動態過程。

1980 年代末到 1990 年代初，在俄羅斯進行的一系列民族誌研究遭遇挫折後，Burawoy 開始面對社會主義退化為資本主義，而非資本主義進化為社會主義的探問。蘇聯的解體對 Burawoy 而言是一個關鍵的轉捩點。他因此放下了手中的生產工具，將研究重心從民族誌方法轉向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探討。他首先從深入思考社會

學馬克思主義開始，並積極參與 Erik Olin Wright 的「真實烏托邦」計畫。隨後，他的研究轉向馬克思主義與一系列重要學者——Gramsci、Polanyi、Bourdieu 和 Du Bois——之間的對話。隨著新自由主義的興起和新一代反抗運動的出現，Burawoy 認識到超越生產車間的抗爭的重要性。因此，他的理論探索也標誌著一個重大轉變：從生產地點轉向公民社會，將其視為新歷史主體出現的重要場域。Michael Levien 在其 2025 年的文章〈Michael Burawoy: 社會學馬克思主義者〉中提出了類似的觀點，指出 Burawoy 的理論介入引導他進入了重建馬克思主義的有趣支流。正是在這個時期，他發展出了他的「馬克思主義之樹」——以馬克思和恩格斯為樹幹，從中生長出多個分支：德國、俄羅斯與蘇聯、西方和第三世界馬克思主義；Bakunin 和無政府工團主義；以及社會民主主義。他使用這個樹的比喻來展示馬克思主義的演變歷程，以及某些分支如何枯萎而其他分支又如何生長的動態過程。

隨著 Burawoy 的學術地位攀升至社會學界的頂峰——先後擔任柏克萊社會學系系主任、美國社會學會 (ASA) 主席，以及國際社會學會 (ISA) 主席——他也將焦點轉向新自由主義大學，以及更具體的社會學學科本身。南非的影響再次標誌了這次轉變，並促使他發展出關於公共社會學的理念。在 1990 年代和 2000 年代，Burawoy 定期訪問南非，接觸到一種充滿活力的社會學，這種社會學深度參與其周遭的社會。這種經驗與全球北方的社會學形成了鮮明對比，促使他發展出一個社會學四種類型的圖示性分類框架：公共社會學、批判社會學、專業社會學和政策社會學。對 Burawoy 來說，公共社會學是最重要、也最核心的社會轉型力量。他將公共社會學定位為動員公民社會、對抗日益興盛的新自由主義 (Burawoy 稱之為第三波市場化) 以及確認民族國家重要性的關鍵堡壘。同時，他也呼籲發展一種立足於本土但指向全球的全球社會學。

> Burawoy 的社會學馬克思主義之樹

Burawoy 非凡的知識旅程，或許能以「Burawoy 社會學馬克思主義之樹」作為最佳的描繪。如同他描繪的馬克思主義之樹一樣，他透過社會學馬克思主義，從堅實的學術著作中，長出了社會學與馬克思主義的根基。對 Burawoy 而言，他思想之樹的根基包括：一個充滿智識活力的童年家庭、早年的海外遊歷、與後殖民社會的遭遇、在尚比亞接觸到的參與式社會學和非洲馬克思主義、學生與政治抗議、視教育為轉化力量的理念、民族誌與延伸個案研究法、比較研究的力量、社會理論的能量，以及對資本主義力量的理解。這些根基向上生長，形成了社會學馬克思主義的樹幹。從樹幹上，長出了粗壯的分支，這些分支包含了：對尚比亞、芝加哥和匈牙利工廠微觀力量的調查研究、對移工與國家的研究、與 Gramsci、Polanyi、Bourdieu 與 Du Bois 等學者的理論對話、對新自由主義大學的批判性研究、對南非種族隔離與巴勒斯坦的比較分析，以及公共社會學的倡議（詳見圖表）。

Burawoy 認為馬克思主義不是一個固定的典範，而是一個不斷演變的理論傳統，它有助於闡明對資本主義運作及其控制方法的具體探究。透過這種方式，社會學馬克思主義得以活化，成為一棵不斷生長與分枝的大樹，新的思想持續從中萌芽，而過去的分析則被「重新造訪」並重塑。

儘管我在這篇短文中試圖描繪 Burawoy 對社會學馬克思主義的非凡貢獻，但這只是淺嘗輒止。從他浩瀚的著作中，仍有太多值得我們學習。對於我們這些有幸成為他的學生和同事的人來說，他傑出的教學、指導與監督為我們留下了啟發性的指引，以及一個可供汲取養分的、令人難以置信的學術寶庫。■

特別感謝 Joanne Morrison 協助繪製樹狀圖，以及感謝 Vishwas Satgar 和 Peter Evans 對本文提出的寶貴意見。

來信寄至: Michelle Williams <michelle.williams@wits.ac.za>

> Michael Burawoy, 這個時代的社會學指南

Geoffrey Pleyers，比利時國家科學研究基金會 (FNRS) 與天主教魯汶大學，
以及國際社會學會 (ISA) 主席 (2023-2027)。



Michael Burawoy 於 2024 年 8 月 28 日在葡萄牙波爾圖。
照片由 Geoffrey Pleyers 拍攝。

Michael Burawoy 於 2025 年 2 月 3 日突然離世。

或 國際社會學會 (ISA) 悼念這位最具影響力、最鼓舞人心的主席之一。他是一位傑出且富有創造力的全球社會學家，是倡導與人民和公民社會息息相關的公共社會學的先驅，更是培育了數代社會學家的啟蒙者，是一位非凡的偉人。

Michael Burawoy 生於 1947 年，最初學的是數學，直到他在劍橋基督學院圖書館偶然讀到一本社會學著作。1972 年，他在尚比亞大學完成了社會學碩士學位，當時他正在銅礦場工作。隨後，他轉往芝加哥大學，並以一篇關於芝加哥產業工人的論文獲得博士學位，該研究後出版為其最具影響力的著作《製造甘願：壟斷資本主義勞動過程的歷史變遷》(芝加哥大學出版社，1979年)。此後，他還在匈牙利和後蘇聯時期的俄羅斯的工廠進行了類似的延伸田野調查。

隨著資本主義與剝削日益依賴知識的商品化，他剖析了新自由主義政策對高等教育造成的衝擊，以及知識生產如何被蠶食以擴張了市場和國家的權力。他力挺公共社會學，主張生產與公民、社會運動和公民社會息息相關的知識。

他在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擔任社會學教授長達 47 年，為數代學生留下了深刻的烙印。作為一位足跡遍及全球的學者，他建立了一個致力於研究與分析的全球社會學家社群，旨在理解世界並提供改變世界的工具。2022 年，他獲得了約翰尼斯堡大學授予的榮譽博士學位；2024 年，美國社會學會 (ASA) 頒發他 W.E.B. 杜波依斯傑出學術成就獎。

他對我們理解社會學及其在社會角色的方式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其研究彰顯嚴謹的實證研究如何滋養理論辯論，反之亦然。透過整合地方、國家與全球視角，他提出了跨越學科的全面分析，為公共政策討論提供洞見。他主張「以理論視角闡釋實證研究」。他對民族誌的熱情不亞於對理論的鑽研。他既關注社會結構分析，亦著重行為者研究，並以馬克思主義視角重新詮釋與推廣該理論。從尚比亞的銅礦場，到為 Du Bois 作為美國與全球社會學奠基者的地位發揮關鍵作用，再到為捍衛面向多元社會背景學生的公共教育而奮鬥，其職業生涯始終直面並剖析種族相關的不公義。他對書本的熱忱不亞於對於人的熱忱——無論是田野調查中相遇的人、課堂裡的學生、學術界的同儕，抑或生命旅程中的過客。這四重身份在他的人生與工作中未曾割裂。作為人、作為教師、作為學者，他始終慷慨大方。

Michael 是我們的指南針，他時常提醒我們，為何社會學在當代如此重要，為何值得投入如此多的時間與精力來實踐與傳授社會學：「社會學幫助學生理解社會如何形成集體，理解種族、階級與性別所扮演的角色。社會學是對不平等及其衍生壓迫的科學探究。社會學研究的正是保守勢力所推崇的排斥現象。但我們研究排斥現象，並非為強化其存在，而是為了辨識與揭露這些機制，進而更深刻地理解如何挑戰並扭轉它們。」(2024 年 3 月 10 日於邁阿密)

Michael 離世之際，正是我們最需要他的時刻，我們需要他的領導力、他的活力、他為幫助我們理解世界所付

>>

出的不懈努力、他作為非凡教師的典範、他對相關公共社會學的信念、他對真正全球對話的開放態度、他基於數月工廠民族誌田野工作所進行的深刻嚴謹社會學分析、他對社會與認識論正義的追求，為巴勒斯坦及世界各地和平正義的堅韌抗爭，以及他獨特的活力、奉獻精神與熱忱。

Michael 的領導力、奉獻精神與熱情，在 ISA 及全球社會學界留下深刻印記。作為協會線上期刊《[全球對話](#)》的創刊人——該刊今年適逢創刊十五週年——他致力「透過社會學視角促進當代議題的國際辯論與討論」。擔任國際社會學協會國家協會副主席（2006-2010）及會長（2010-2014）期間，他足跡遍及全球，傳遞對當代批判性與公共社會學重要性的熱忱。其深刻分析與堅定信念啟發了數千名社會學家，而他的仁厚、慷慨與正直更深深打動眾人。

他離世後，全球社會學界驟然陷入哀悼，面對巨大的空缺。繼 2 月 8 日（星期六）首場[線上追思會頌揚其生平與學術遺產](#)後，ISA 於 3 月在約翰尼斯堡舉行的執行委員會會議，以及 7 月 6 日至 11 日在摩洛哥拉巴特舉辦的 ISA 社會學論壇，均安排了後續追思活動。此外，各 ISA 研究委員會、工作組及專題小組亦發起多項紀念行動。

Michael Burawoy 的貢獻將持續塑造社會學家理解與參與世界的方式。誠邀您重溫他在 2014 年橫濱 [ISA 世界大會的主席演講](#)，其中闡述了他對社會學、全球對話與正義的願景。我們將開放[該演講文章](#)及其在《[當代社會學](#)》[期刊其他著作](#)的閱覽權限。

Michael 不僅留下了享譽盛名的著作，更傾注心力打造凝聚社會學者的平台與工具，ISA 正是其中之一。唯有齊心協力，我們才能秉持堅定信念——在當今艱難時代，社會學至關重要——繼承並發展他的學術遺產。■

來信寄至：

Geoffrey Pleyers

<Geoffrey.Pleyers@uclouvain.be>

> Michael Burawoy, 社會學作為一種志業

Nazanin Shahrokni, 西門菲莎大學, 加拿大

Michael Burawoy 不只是一位社會學家；他更是一位社會學的締造者——這不僅體現在他的理論貢獻上，還體現在他塑造的學術機構、他悉心培育的人際網絡，以及他締造的全球團結之中。他將社會學這門學科轉化為一個反思性且實踐導向的場域——一個質問權力、關注邊緣、連結批判與想像、橋接理論與行動的領域。

秉持著這種精神，我在本文中反思了 Michael 的貢獻，並強調了他對這門學科、其方法論、教學法以及全球連結所留下的深遠影響。

> 活生生的社會學：體現實踐，反思方法

Michael的社會學不單是一種理論取向；它是一種活生生的實踐，植根於運動、鬥爭和歷史意識之中。他的最後一本書《公共社會學：在烏托邦與反烏托邦之間》，總結了他數十年來對社會學雙重使命的反思：即批判現狀的同時，也要培養替代性未來的想像。Michael為這些相互矛盾的脈動賦予了精確的含義：烏托邦對他而言，並非完美社會的藍圖，而是一種對話性的、集體想像替代方案的過程，是維持批判思想得以存續的必要力量。他告誡道：「沒有烏托邦，社會學就只能鏡映出絕望。」反烏托邦則與之對立，它是一種祛魅但必要的懷疑精神，用於節制天真的樂觀情緒。對 Michael 來說，社會學就棲居在這兩極之間的張力之中——在渴望變革與認識到阻礙變革的因素之間。正是在這種「是什麼」與「可能成為什麼」之間的張力裡，他將社會學培養成了一種志業。

Michael 計畫的核心是對學科本身的批判；他持續努力從內部重塑社會學。他挑戰社會學的歐洲中心主義、封閉的經典，以及它對既得利益的複製。儘管他身處學術聲望的中心，但他不斷努力將自己去中心化——將DuBois、女性主義思想和全球南方知識論推到前台。他選擇棲居於邊緣，不斷向外、向下延伸：深入社區、工作場所，以及那些經歷不穩定狀態的人們的生活。

在他 2004 年的[美國社會學會 \(ASA\) 主席致辭](#)中，他著名地描繪了四種社會學：專業社會學、政策社會學、批判社會學與公共社會學。這些並非各自獨立的孤島，而是一種整合的、辯證的實踐願景。對他來說，公共社會學並非學科中柔弱的一翼，而是它的良知。他讓社會學承擔起責任，堅持要求我們反思：我們為誰生產知識，這麼做的目的是什麼？他對公共社會學的呼籲，是要求重新配置知識構成的根本基礎。正如他經常所說，公共社會學不是外展服務；它是一個轉化所有參與者的對話過程。

Michael 的這份承諾也延伸到了他參與社會運動的方式。他踐行著他的理論。他能夠在研討室與前哨線、國際社會學會會議與工廠車間之間無縫轉換。從南非和尚比亞的工會主義行動，到反種族隔離運動、佔領奧克蘭行動、研究生組織，以及聲援巴勒斯坦，Michael 的工作模糊了學術與行動主義之間的界線。

這種對社會學的轉化性願景與他的方法論承諾密不可分。Michael 知識遺產的核心是延伸個案法：這是一種不追求常規演繹式向外概括的研究取徑。相反，它是從日常生活中觀察到的矛盾出發，延伸至對塑造這些矛盾的更廣泛社會結構的理解。對 Michael 而言，反身性不是一種懺悔，而是一種知識理論。

這種方法論的承諾在他最持久的貢獻之一中得到了進一步的體現：他與九位研究生合作完成的《全球民族誌》(Global Ethnography)。這本書引入了「在地全球化」(grounded globalization) 的概念：一種獨特的方法，它不是透過抽象模型或宏觀流動來理解全球進程，而是透過追溯全球力量如何在特定、在地化的經驗中折射出來。總而言之，這些方法——延伸個案法與在地全球化——體現了 Michael 的信念：理論必須從底部建構，在與活生生的現實對話中產生，並且始終關注使知識成為可能的那種結構性條件。

> 傳授社會學，踐行對話

對Michael而言，教學並不從屬於研究：它是轉型社會學的根基。他堅決反對教學法是中立的觀點。

>>

「麥可堅信理論必須從下而上建立, 與真實生活對話」

他認為，教學和研究一樣，都鑲嵌在更廣泛的權力結構之中，尤其是在新自由主義大學的語境下。在他的著作《在壓榨型大學中勞動》(Laboring in the Extractive University) 中，他將大學診斷為一個剝削的場域，學生和教師經常與學習過程異化。然而，他也同時在教室中看到了激進想像的潛力；一個將社會學探究培養成批判與關懷的雙重空間。

他經常說：「我們的第一個公共群體是我們的學生。」在他眼中，每位學生都是一個值得傾聽的故事，一個值得探索的挑戰。他創造了一個集體學習的空間，在那裡，思想可以激烈而慷慨地辯論，知識從不被囤積而是分享。作為他的學生，我逐漸體會到，Michael 最偉大的天賦在於建立一個社群，讓我們可以在其中識別和培養彼此的洞察力與潛能。他將我們個人的掙扎，視為進入理論分析的切入點，而非干擾因素。

他在課堂中體現了團結的倫理；他經常在出版物中鳴謝 (crediting) 學生，承認助教的勞動價值，並將他們視為知識分子而非輔助人員來指導。

毫無疑問的，他是他那一代中最受愛戴的老師之一。但更重要的是，他重新定義了教學的可能性，並在街頭傳授了最令人難忘的課程：無論是在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的 Sproul 廣場的教學研討會，還是在前哨線上。對他而言，教學法和傳道授業與政治承諾及集體鬥爭密不可分。

對於我們這些門生來說，Michael Burawoy 並沒有創造一個思想流派。他創造了一個實踐社群；這個社群的定義並不基於追隨者，而是建立在異議之上。他不想被追隨。他希望有人與他辯論。我們並不都遵循特定的理論典範——甚至不包括深深影響他自身工作的馬克思主義。讓我們團結在一起的，不是方法論上的一致性或意識形態上的結盟，而是對世界的一種共同取向：一種對社會學思維之迫切性的信念，以及它闡明並重塑我們生活條件的能力。他的社會學深深鑲嵌於、回應於並對其時代的政治和倫理挑戰負責，我們的社會學亦是如此。

Michael 將教學視為一種勞動的承諾，與他對全球社會學的承諾直接相關。

> 全球社會學：從團結走向結構

對 Michael 而言，國際社會學會 (ISA) 不單是一個行政平台，更是實現其全球社會學願景的實驗室。他反對僅憑擴大全球參與度——無論是透過會議、合作或引用——便足以達成目標的觀點。相反的，他呼籲對學科的

知識結構進行更深層次的轉化。借鑒 Chakrabarty 的「將歐洲地方化」(provincializing Europe) 概念，Michael 主張社會學必須正視其來自北方的偏見，並重新分配知識權威。對他來說，國際化並非將邊緣納入一個主導模式，而是要培養一種根植於相互認可和民族傳統活力的、對話性的、多中心的社會學。

Michael 呼籲從知識的垂直整合——即理論在全球北方生產，數據在全球南方收集——轉向水平的交流結構，讓理論和經驗貢獻能夠從世界各地湧現。對 Michael 而言，全球社會學不是對「全球」進行研究；它是將社會學作為一個學科進行全球化：連接聲音、重新分配權威，並促成更公正、更具包容性的知識生產。他的全球社會學願景並不是壓榨式的。相反，他強調互惠性。正如他在《社會學的全球化》中所寫：「除非我們也將知識的生產條件全球化，否則我們無法實現社會學的全球化。」

在他的帶領下，《全球對話》創刊。這本多語種期刊旨在跨越語言和地緣政治的界限來傳播社會學辯論。它被翻譯成 15 種語言，體現了他對多語種、多聲道、多中心社會學的堅持。他深知翻譯不僅是技術性的，更是政治性的。他支持擴大國際社會學會 (ISA) 的區域影響力、民主化其結構，並支持身處政治或經濟不穩定環境中的學者。

他在 2008 年對伊朗的訪問，捕捉了這種精神的精髓，我亦有幸隨行。他拒絕讓簽證制度、制裁或國家鎮壓——以及政治、語言或學科的邊界——來決定他能夠與誰接觸。當伊朗社會學被國際制裁和國內鎮壓所孤立時，Michael 堅定地說：「如果他們沒辦法來找我們，我們就必須去見他們。」他也確實這麼做了，下定決心要確保伊朗社會學家仍然是全球對話的一部分。在其他人眼中，那是一個被排斥的國家，而在他眼中，那是一個知識社群。他渴望觀看、傾聽和學習——以及他讓周圍所有人都感受到被看見、被聽見和被認可的天賦——在他伊朗的同事們心中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記。

在伊朗，Michael 作為一位充滿同理心的對話者的角色，與他內心不懈追求的卓越民族誌學家並存。他沒有將自己侷限在德黑蘭舒適的飛地中，而是冒險深入首都之外，乘坐往返於伊朗小城鎮的巴士。他向我們提出挑戰：「不然你要如何與民眾建立聯繫？」我們笑著提醒他：「Michael，你連一個波斯語單字都不會！」然而，事實證明了，語言並非障礙。Michael 有一種不可思議的能力，能夠棲居於各種空間，去吸收和反映當地生活的紋理。他從來不是一個疏離的觀察者；他是周圍正在展開的故事的參與者。無論是與巴士司機聊天、和攤販討價還價，還是與大學教授交流思想，他都以其真誠的好奇心和

>>>

標誌性的幽默感，突破了每一道牆，鑄就了超越言語的連結。他教會我們，民族誌的相遇不在於語言的掌握，而在於人類的好奇心與尊嚴。

當被問及他想對 Ahmadinejad 總統和 Bush 總統傳達什麼訊息時，Michael 回答：「要求總統們必須修習社會學 101 課程。」在當今的環境下，政治領導人越來越多地削減社會科學的經費並使其合法性受損，他的俏皮話聽起來就不再像一個笑話，而更像是對權力與批判知識之間疏離狀態的預言式批判。

在 Michael 的造訪後，伊朗社會學會隨即成立了一個專門的公共社會學分會，如今這個分會已成為學會最有活力和最活躍的分支之一。我曾有幸翻譯他對公共社會學的呼籲，並協助將此概念引介給波斯語學術社群。他的理念引起了深刻的共鳴：此後，學界組織了眾多關於公共社會學的書籍出版和研討會，包括 Michael 的論文和訪談在內等重要文本也被譯成波斯語；伊朗社會學家們擁抱了他關於參與式、批判性學術的願景；而在他逝世後，伊朗社會學會還舉辦了特別的紀念活動來緬懷他。國家報紙報導了他的學術遺產，強調他的訪問和思想對伊朗社會學界景觀所留下的深遠影響。

對 Michael 而言，全球社會學是一種實踐——它是一種跨越邊界的傾聽、跨越差異的翻譯，以及一種堅持知識除非被分享、被爭論並以多種語言表達，否則它永遠不是真正全球化的信念。

> 傳承這項事業

在當今不平等日益加劇、威權主義崛起、氣候崩潰以及全球流離失所的景象中，Michael 對公共的、批判的、充滿希望的社會學的堅持，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為迫切。他教導我們，社會學必須回應其所處時代的條件，而且它在危機時刻蓬勃發展；不是儘管有危機，而是正因為有危機。

傳承他的遺產意味著要維護他所體現的價值觀：

- 批判性探究要植根於對話與謙遜；
- 教學是相互轉化的場域；
- 研究要跨越隔閡、與公眾互動；
- 拒絕將分析與責任分離。

或許，這就是他在國際社會學會 (ISA) 留給我們的遺產：不僅是一套概念或類型學，而是一種實踐社會學的方式——它既是批判性的、對話性的，同時又對它試圖理解的世界負有深切的承諾。■

來信寄至：

Nazanin Shahrokni

<nazanin_shahrokni@sfu.ca>

> Michael Burawoy: 在抵抗的馬克思主義與公共社會學之間

Ruy Braga, 聖保羅大學, 巴西

在 2025年2月3號的晚上, Michael Burawoy 不幸地在加州奧克蘭自家附近遭遇嚴重車禍, 雖然駕駛事後逃逸, 但隨即被警方逮捕。他的死亡代表著當代最重要的馬克思社會學家的離去。Michael 的學術生涯致力於在理論與人類解放實踐之間維持有機的連結, 同時在官僚國家社會主義瓦解後, 重新將馬克思主義帶入大學中。

在 Michael 長達47年的學術生涯中, 他傾心於學生的培育與同儕的合作中, 最終在2023年於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的社會學學院退休。自1970年代起, 隨著他發表了重塑勞動研究的革命之作《[製造甘願—壟斷資本主義勞動過程的歷史變遷](#)》, 他以嚴謹的實證研究以及開放的對話精神奠定了學術根基, 成為批判馬克思主義的重要人物。

在他的一生中, Michael 是位傳奇般的老師, 常以自身的魅力與幽默吸引滿堂聽眾, 同時又細心地關注每位學生。他總在每堂課上逐次記下幾位學生的名字, 並悄悄的在黑板上記下, 一直到學期末時, 他幾乎可以記下所有學生的名字。作為一名指導者, 無數人都見證了他在協助學生研究時所展現的關懷與投入。過去的四十多年間, 他一共指導了84位博士生, 並常將他們的研究納入全球的比較中, 進而催產出具影響力的集體著作。他在研究所開的專題研討課與他在大學部開的課程一樣受到歡迎。Michael 的投入反映了一種深厚的團結精神, 這種精神既啟發了他的研究, 也塑造了他的方法論取向。

> 一場創新且富有啟發的旅程

在社會學的歷史中, Michael 是「延伸個案法」最重要的代表人物, 延伸自人類學中的曼徹斯特學派, 並在他的社會學馬克思主義中被系統化。延伸個案法不僅是種分析工具, 更是一種縝密的實證取徑, 尤其善於連結微觀經驗與社會再生產及變遷的宏觀過程。這種方法應用於民族誌的反身性科學中: 在特殊中看見普遍、由微觀推及宏觀, 並連結當下與過去, 同時展望未來。透過延伸個案法, Michael 以工人的經驗闡述了生產如何連結到更大的社會結構。作為一個參與觀察者, 他強調馬克思社會學的道德基礎: 人類歷史是社會建構的, 因而有重塑的可能, 並且理想上往更公正的方向前進。

團結、正義、平等和自由等價值對 Michael 來說, 與科學實踐密不可分。社會學家不應否定這些價值, 而應反思性的接受這些價值所可能帶來的啟發。他的實證以及認識論基礎建立在學術中罕見的場域: 尚比亞的銅礦場、芝加哥的引擎工廠、匈牙利的製鋼場和俄羅斯的傢俱工廠。他橫跨四個國家, 從事機器操作員、熔爐工人以及人事專員的工作, 透過生產現場的經驗精煉自身的分析視角, 並以此檢視四個重大的歷史轉型: 非洲解殖、福特主義的鞏固、官僚社會主義的崩解以及新自由主義的興起。他的理論結合了 Gramsci、Luxemburg、Trotsky、Fanon 和後期 Du Bois 等人的非正統馬克思主義, 同時也納入了 C. Wright Mills、Alvin Gouldner 和 Karl Polanyi 等人的激進社會學理論。

在1990年代初期, Michael 與摯友 Erik Olin Wright 共同展開一項宏大的計畫, 旨在重構「社會學馬克思主義」, 此一理論被界定為對資本主義社會關係中矛盾性再生產的分析。他們希望挽救在國家社會主義失敗後被削弱的馬克思主義, 與其中的解放潛能。Göran Therborn 形容這是21世紀初期「抵抗性馬克思主義中最有野心的計畫」。此計畫沿著兩個互補方向所開展: Wright 的「真實烏托邦」以及 Michael 的「公共社會學」。兩者皆鼓勵社會學界無論在學術圈內或外, 皆以批判性的態度與多元公眾互動, 並以此作為社會變革運動中的一環。他們兩人皆曾擔任美國社會學會 (American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ASA) 的理事長, Michael 隨後更出任國際社會學會 (International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ISA) 的理事長, 並在44個國家推廣他的公共社會學理念。

> 公共社會學

公共社會學在 Michael 的想象中, 是一種以學術圈外的公眾為對象的反思性且批判取向的社會學, 致力於實踐正義、自由、平等、民主和團結等解放性價值。Michael 常打趣地說, 如果政治學研究的是國家, 經濟學研究的是市場, 那麼社會學研究的就是公民社會以及其中的矛盾與歷史挑戰。不意外地, 公共社會學與全球各地抵抗勞動、自然、金錢和知識商品化的抗爭運動相呼應, 尤其是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後。同時, 他強調研究反動運動的必要性, 包含在2010年代興起的威權民族主義, 與由其推動的全球極右派浪潮。他認為,

>>

「人類歷史是社會建構的， 因此可以被社會重建——理想地以更公正的方式。」

公共社會學有必要揭露潛藏於這些當代專制「病態徵兆」(Gramsci) 背後的結構與過程，同時也能策略性的支持民主的再生。

2014年結束在ISA的理事長任期後，Michael返回至柏克萊，擔任教職員協會的代表，為加州公立大學中處於不穩定勞動條件的教師們發聲。他在2023年全力支持教學助理罷工的行動，再次展現了他對社會正義的堅定承諾。綜觀他的一生，他持續參與多樣的行動：聲援尚比亞的獨立運動、反對南非的種族隔離、支持大學中女性反性騷擾的運動、加入反對烏克蘭戰爭的動員，並譴責以色列對巴勒斯坦人民在加薩進行的種族滅絕，這也是他過世後發表的文章主題。在全球社會學的歷史中，沒有人能像他那樣，將多國的田野研究與參與人類根本訴求的政治行動結合在一起。Michael必將以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一位團結精神的傳授者以及一名將社會學轉化為解放工具的公共知識份子為眾人所銘記。

> 在巴西的Burawoy

Michael在2007年因參與位在勒西菲舉辦的拉丁美洲社會學會議(Latin American Congress of Sociology, ALAS)，而首次與巴西社會學界建立了直接的聯繫。此行期間，他在聖保羅、坎皮納斯、阿雷格里和里約熱內盧等地的大學發表演說。當時他擔任了ISA的副理事長，並積極推動「公共社會學」。這也是他在過去幾年形塑的計畫，並在過去競選ASA理事長時廣泛討論的理念。

自那次交流以來，Michael定期造訪巴西，並經常受邀參與研討會、會議以及各式學術活動。他在巴西社會學會(Brazilian Sociological Society, SBS)以及全國社會科學研究與研究生協會(National Association of Graduate Studies and Research in Social Sciences, ANPOCS)的活躍身影也成了一種學術象徵，使他成為巴西最具知名度的社會學家之一。透過這些交流，當地許多學者與學術機構吸收了Michael的觀點，並進行對話溝通，使他與巴西社會學界建立了獨特的關係。

巴西學界對Michael的認可並非只具象徵意義。根據以2010到2024年間SciELO資料為基礎的文獻計量學分析，Michael是巴西學術期刊中被引用次數最高的前15位國際社會學家之一。這不僅展現了他研究成果的深遠影響，也突顯出他的公共社會學與巴西批判性學術傳統對話的能力，鞏固了一種具公共關懷且與全球緊密連結的社會學。

Michael在巴西的長期參與對聖保羅大學的公民權利研究中心(Center for the Study of Citizenship Rights, Cenedic)所發展的研究計畫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該中心多次邀請他訪問，最近一次是在2023年，並與他展開多方且豐富成果的合作。他的影響也塑造了我自身的學術軌跡，在他的啟發下，我致力於重塑以實證研究為基礎的批判社會學式馬克思主義，並透過分析巴西工人階級的轉型以完善「個案延伸法」。

與Michael的對話顯著的強化了Cenedic內部的公共社會學取向，這項計畫的核心人物是Chico de Oliveira。Chico為我與Michael合編的《為公共社會學而作》撰寫序言絕非偶然。這象徵了拉丁美洲馬克思主義的反思以及國際公共社會學這兩種批判傳統的交會，並發展出共享的知識與政治視野。

在2023年最後一次造訪聖保羅時，Michael參與了我的新書《無產恐懼：種族資本主義下的勞動與團結》的發表會，該書聚焦於美國工人階級轉型的分析。本書直接與美國黑人社會學家W.E.B. Du Bois展開對話，Du Bois也是Michael近年最關注的思想家之一。在Michael過世時，他正準備撰寫一本以Du Bois為主題的書籍。Michael對Du Bois的投入，為他的公共社會學注入了一項新的核心議題：透過納入歷史中被邊緣化的知識傳統，批判性的重建社會學典範。

這份思想遺產持續在巴西開花結果，近年來，像是AfroCebap小組等團體積極推動Du Bois著作在葡萄牙語世界的翻譯與推廣，並將他的思想與巴西社會科學相結合。他們透過強調種族議題，並分析資本主義與種族主義間的全球歷史性關係，來拓展詮釋框架。Michael和Du Bois思想的交會，不僅強化了全球連結的公共社會學框架，同時也提供巴西一個深化種族資本主義批判理論的框架，並進一步與國際理論和國內歷史經驗相連結。

> 最後一次見面

我最後一次親自見到Michael是在2024年10月的約翰尼斯堡。在那頓他一如往常堅持要付錢的難忘晚餐後，我將他送到我們親愛的朋友Williams和 Vish Satgar的家門前。我當時之所以住在南非，是因為十多年前Michael讓我看見了南非社會學研究的獨特重要性，對此我仍舊深懷感激。

那天，我們邊討論他將於2025年7月參與的巴西社會

>>

學大會細節，邊互道了再見。他原本打算在會議上談論巴勒斯坦人民持續遭受的屠殺，並對大學中能否開誠布公地討論如此敏感的議題感到憂心。我向他保證，他一定會受到熱烈歡迎，在那樣的場合中，聽眾們都可望傾聽他，並願意認同他真正的身份：在他那一代中最偉大的馬克思社會學家。■

來信寄至：Ruy Braga <ruy.braga@usp.br>

> Burawoy 與全球公共社會學的實踐： 與俄羅斯的對話

Pavel Krotov, 皮蒂里姆·索羅金基金會, 波士頓, 美國; Tatyana Lytkina, 科米科學中心, 俄羅斯;
以及 Svetlana Yaroshenko, 聖彼得堡社會學家協會, 俄羅斯。



Michael Burawoy 於 2002 年在 Komi 的田野。照片由 Tatyana Lytkina 拍攝。

著 名社會理論家暨公共社會學倡導者 Michael Burawoy, 於七十七歲辭世。他畢生致力社會學研究, 揭露隱藏的社會藩籬、探討多元不平等現象, 並促進社群間的連結——也包括了學科內部各領域的交流。

麥可既是我們摯友、導師與同儕, 亦將永遠是照亮社會學領域中許多面向的璀璨明燈。他的學術貢獻與思想將永存, 尤其對探討新自由主義資本主義發展軌跡、公民社會在市場與國家壓力下脆弱性之研究者而言, 更是如此。在此簡短悼文中, 我們聚焦他非凡生涯的獨特面向: 他與俄羅斯的淵源, 以及我們共同致力理解資本主義動態、俄羅斯人民生活經驗, 並探索公共社會學推動社會變革潛能的協作歷程。

> 國家社會主義下勞工運動的萌芽

1986年, 改革運動起始之際, Michael 與 Erik Olin Wright 一起前往莫斯科, 他們與蘇聯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的學者展開合作, 共同進行蘇聯與美國階級意識的比較研究。

歷經十日「令人沮喪卻發人深省」的討論, 雙方特別對於——馬克思主義範疇的運用, 以及蘇聯學者公開剖析現實社會主義內在矛盾, 那相當猶豫的態度, 出現極大在意識形態與詮釋上的分歧。

自此之後, 兩位學者各自踏上不同研究路徑。Wright 再也沒有回到俄羅斯。相較之下, Burawoy 則致力於開啟

>>



Michael Burawoy 於 2015 年在聖彼得堡歐洲大學的公開辯論中。
照片由Tatyana Lytkina拍攝。

對蘇聯工業全面性的民族誌研究，類似於他在匈牙利的研究。他視蘇聯社會主義並非悲劇性的偏離了社會主義理想，而是其表現形式之一——國家社會主義——值得批判性實證考察。他提出關於勞動組織、工人意識，以及勞動運動在國家社會主義體制中比先進資本主義社會更為蓬勃發展的悖論等問題。

> 朝向市場資本主義的轉型

1991年，Burawoy開始在科米地區的家具廠進行參與式觀察，並透過觀察將其驗證紀錄於著作《製造甘願》(1979年)中，並於《輝煌的過去》(1992年，與Janos Lukács合著)一書中又深化的闡述了假說。他區分對勞動過程的控制(生產關係／生產的社會關係，relations of production)與勞動過程內的控制(生產中的關係／生產過程中的社會關係，relations in production)。在蘇聯體制下，工人以獨特的方式展現了「生產中的關係」。由於體制性短缺與長期的效率問題，管理者為確保生產不中斷，往往必須放棄部分操作控制權。這種悖論的自主性，使工人獲得一定程度的現場權力，反而體現了行政命令體系的彈性與韌性。

其研究最初旨在比較晚期社會主義時期的蘇聯與匈牙利勞動狀態，然而田野研究的結果卻顯示出：指令型經濟正逐漸瓦解，被以物易物式的交換關係所取代。這樣的轉變並未促成工人自我組織，反而導致了混亂而非自我組織。工廠淪為無中央管理的碎片化場域，進一步催生了商業資本主義與寡頭階級的崛起。

1992年至1994年間，Burawoy的研究範圍擴展至Vorkuta的煤田，當時礦工罷工與改革措施在此地激烈衝突。透過與世界銀行專案合作，他們對十二座礦場進行社會學分析，凸顯了休克療法(shock therapy)的劇烈影響。工人們因市場自由化而幻滅，逐漸放棄集體抗爭——「向

歷史天使低頭」。隨著市場自由化加劇了曾積極組織抗爭工人的失序與絕望，他們逐漸陷入無力與順從——「[向歷史的天使低頭](#)(bowing before the angel of history)」。

> 市場壓力、性別轉向與經濟內捲化

隨工業企業的崩潰，工資拖欠現象逐漸普遍化，取代工資的補償有時會以高價食品的形式提供給工人們。此時，經濟活動也轉移至家庭領域。

自1994年起，Burawoy與Lytkina透過家訪來調查勞工們的生存策略，發展出受Karl Polanyi《鉅變》啟發的後社會主義轉型理論。Burawoy呼應波蘭尼的觀點：「市場若無被破壞或反抗，便無法建構社會」。

在後蘇聯時期的俄羅斯，社會抵抗的形式表現為家務勞動的加劇、非正式經濟的復甦，以及勞動、金錢、自然與照護的商品化——這些現象都深深植根於具有文化意涵的社會關係之中。訪談顯示出鮮明的性別分化：女性成為事實上的家庭戶主，彌補男性地位與就業的喪失；同時，以親屬關係為基礎的支援網絡常取代了功能衰敗的國家。而對於從事小規模貿易或服務業的勞動階層女性而言，這種創業行動反而強化了家庭對勞動的依附，使她們更難脫離匱乏的循環。

Burawoy、Krotov與Lytkina將此現象概念化為「[內卷化](#)」(involution)——一種以犧牲社會再生為代價、僅為延續生存而進行的退化性適應。

> 新自由主義國家壓力與排外邏輯

「內卷化計畫」(The Involution Project)由科米科學中心(Komi Science Center)下屬的北方社會經濟與能源問題研究所(Institute for Socioeconomic and Energy

>>

Problems of the North, ISEEP) 主辦。Burawoy 透過田野調查與開放式的協作對話，將原本的實證困難轉化為理論上的概念創新。

隨之而起的新研究，聚焦於分析 1996 年後俄羅斯選擇性社會福利體系的運作。我們共同探討城鄉居民如何獲得或失去「官方貧困」的身分，以及政策如何在制度實踐中重新塑造「貧困」的定義與意涵。

儘管 Burawoy 的研究根植於馬克思主義，他在理論上秉持多元主義，認同將 William Julius Wilson 的城市貧困理論應用於俄羅斯的狀況上，展現了如何以實證研究重新活化理論分類。

隨著勞工權益遭侵蝕、合法罷工也幾近不可能，國家放棄了對勞動市場的監管。與此同時，貧困的定義日益收窄。更甚者，隨著貧困人口的規模與結構變化，國家多次調整「需援助者」(those in need of support) 的登記規則。對低收入者而言，此舉實際上等同於嚴格的規訓，進一步擴大了社會保障權利的排除範圍。官僚體系——包括國家機構、政策專家以及工會——的疏離態度，使社會陷入孤立的「原始生存鬥爭」(primitive struggle for survival) 狀態，不僅否認了貧困作為生存策略的正當性，並導致階級認同逐漸消解。

> 知識的商品化與公共社會學的抗爭

後來，Burawoy 將研究焦點轉向高等教育領域，在新自由主義體制下，大學裡的知識與學術勞動正日益商品化。

2007 年應 Svetlana Yaroshenko 之邀，他在聖彼得堡發表關於公共社會學的主題演講。2015 年再度造訪時，他發表了《社會學作為志業》(Sociology as a Vocation) 並參與 [俄羅斯社會學未來發展](#) 圓桌會議。

Burawoy 強調，社會學承擔著凝聚社會而非製造分裂的使命，它既是一門科學學科，也具備道德與政治功能。他主張，豐富的社會學知識應回歸到邊緣化的公眾之中。儘管他深知俄羅斯公共社會學面臨諸多結構性限制，但樂觀的態度與突破困境的經驗，仍使他堅信專業社會學與公共社會學可以共存並互相促進。

2015 年，在學術壓力日益增大的背景下，他呼籲社會學家抵制對學術績效指標的盲目追求，並將自身的抗爭置於歷史脈絡中加以審視，認知個體與社會的相互關聯，同時發展基於實證、契合在地情境的理論——無論是借鑒外來理論，還是在俄羅斯脈絡中加以重塑。

他倡導社會學家之間的團結與互助，積極參與自發形成的公民社會，強調集體探究所帶來的變革力量及其公共意義。

> Michael 作為理論具體化的體現

Michael Burawoy 將對社會學的熱情與對全球資本主義所衍生不平等的敏銳洞察，兩者完美結合。他的跨國研究——包括在俄羅斯的田野工作——展現了社會學家作為一個潛在「具危險性」的知識階層：他們與公民社會緊密相連，對不平等的運作機制保持警覺，並能將個人苦難轉化為集體行動。

最重要的是，我們記得他的專注、開放、慷慨與智慧。他以真誠的尊重傾聽，跨越隔閡、打破層級，並在日常互動中促進平等。他對結構與能動性的洞見，源自對工人生活的深刻、富有同理心的投入。

對我們而言，Michael Burawoy 不僅是公共社會學的理论家——他更是公共社會學活生生的體現。■

來信寄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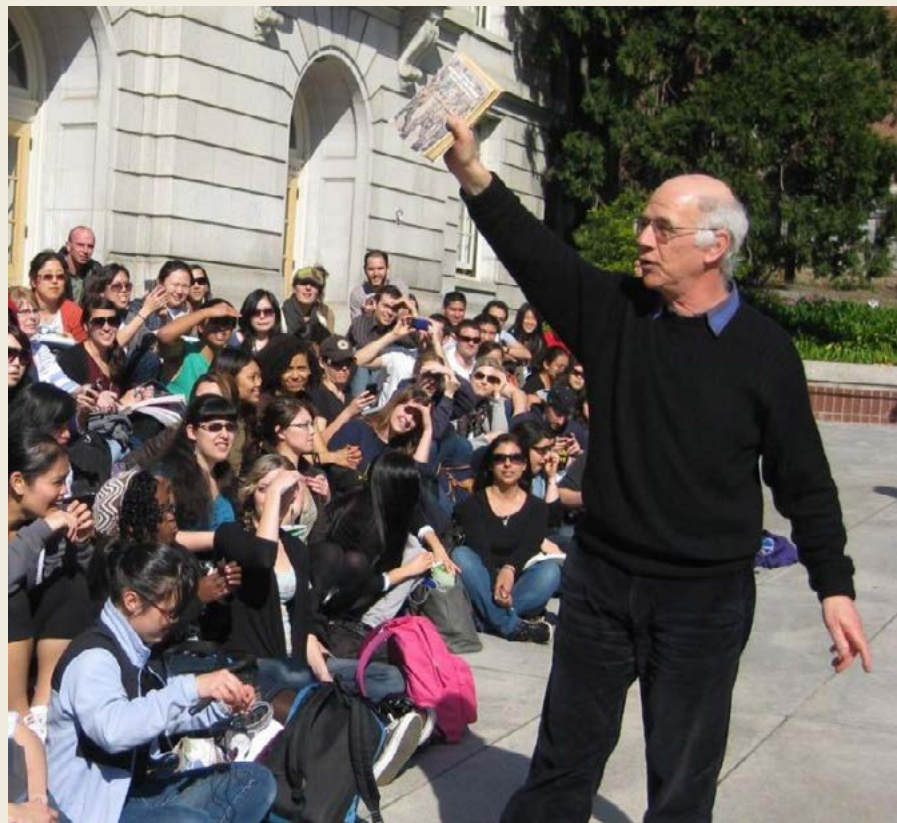
Pavel Krotov <pasha.boston1307@gmail.com>

Tatyana Lytkina <tlytkina@yandex.ru>

Svetlana Yaroshenko <svetayaroshenko@gmail.com>

> Michael Burawoy: 公共社會學與意志的樂觀主義

Fareen Parvez, 麻州大學阿默斯特分校, 美國



Michael Burawoy 在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 Wheeler Hall 外演講。
照片由 Ana Villareal 拍攝。

Michael Burawoy 是我的博士學位指導教授，從 2001 年起便走進我的生命。我有幸與他共享了長達 24 年豐富而美好的對話。在我得知他噩耗的幾小時前，我還寄出了給他的最後一封郵件，與他分享我對於一場巴勒斯坦教學研討會的想法，他對此慷慨鼓勵。就在我剛教完他那篇卓越的 2000 年論文〈共產主義之後的馬克思主義〉的幾分鐘後，我收到了語音留言，接著讀到了那封令人心碎的郵件。

協助緬懷他的遺產，對我來說既痛苦又暖心。跨越國界的交流對 Michael 而言始終至關重要，這份信念從最初便根植於他的心中，隨後透過他在國際社會學會 (ISA) 的工作，以及過去十五年來他到世界各地會見社會學家的廣泛旅行，此一精神得以延續。

Michael 指導了大約 80 位博士生的論文。許多人因為對勞動或前蘇聯與後共產主義轉型的興趣而慕名而來。

也有許多人則因為他對民族誌、全球比較研究，或因為他的馬克思主義的社會學取徑而選擇他作為指導教授。我屬於最後一類，這也意味著我當時並未深入接觸 Michael 的許多實證研究。但現在我正沉浸其中，竭盡所能地發掘和鑽研他的作品。每當我重讀 Michael 的著作時，總會被他寫作中蘊含的詩意所打動。他在現實生活中傳遞出的那種熱情，在他筆下的文字中依然鮮活地跳動著。

> 具有道德責任感的民族誌學者、社會學家，
始終是個馬克思主義者

作為一位民族誌學者，Michael 曾擔任機器操作員、旋臂鑽床操作員 (我甚至不確定那是什麼!)，也曾擔任橡膠工廠與香檳工廠的工人，還曾在俄羅斯北極圈的傢俱廠中工作過 (我曾和他開玩笑說，我很想去參觀那個地方)。Michael 早期的致力於探討關於尚比亞銅礦場中的種族與階級問題。他撰文闡述了美國工廠中工人如何同意

>>

自身被剝削的根基、生產過程，以及維繫這些剝削的各種國家干預與意識形態體制。他也論及實際存在的社會主義在匈牙利的情況，以及蘇聯向資本主義的轉型。他持續深入地探討 Polanyi 的思想和反社會運動不斷變化的性質；並與 Bourdieu 進行了精心且長達數年的對話，最近則轉向了 Du Bois 的社會學研究，以及更宏大的去殖民化經典學術工程。他撰寫了許多關於民族誌的著作，包括我最喜愛的《延伸個案法》，當然還有關於重建馬克思主義的論述。Michael 還批判了大學的新自由主義化、南非的種族資本主義。最終，在他最後的項目中，是對巴勒斯坦的承諾；他將其理解為一個定居殖民主義的案例，並藉此與南非的種族隔離進行比較分析，而最重要的是，他激勵和提醒美國社會學家，我們有道德責任發聲，以減少巴勒斯坦人民的苦難。

> Michael著作中的詩意摘錄

我想分享他作品中一些我最喜愛的如詩句般的段落：

「什麼是實證科學？對於 Auguste Comte 而言，社會學將取代形而上學，揭示社會的經驗法則。它是最後一個進入科學王國的學科，但一旦被接納，它將統治混亂的領域，從混沌中產生進步的秩序。因此，實證主義既是科學，也是意識形態。」（摘自《延伸個案法》，第 31 頁）

「在反身性科學看來，介入不僅是社會研究不可避免的一部分，更是一種值得利用的優點。正是透過相互的反應，我們才能發現社會秩序的性質。介入創造了擾動，這些擾動不該被視為必須清除的噪音，而應被視為值得欣賞的音樂，傳遞著參與者世界中隱藏的秘密。」（摘自《延伸個案法》，第 40 頁）

「難道沒有什麼特別的理由，值得我們支持巴勒斯坦事業嗎？……或許，正在發生的巴勒斯坦大屠殺是所有暴行中最令人震驚、最為野蠻的。它在我們的螢幕上直播；它擺在我們面前；它是無可逃避的。西方列強對以色列的無條件支持，賦予了它世界歷史性的意義。對於一位社會學家來說，僅僅表態你站在哪一邊然後走開是遠遠不夠的；作為社會學家，我們必須將我們的政治承諾鑲嵌在理論框架之中。在一個「後殖民主義」的時代，以色列對巴勒斯坦人系統性且透明化的壓迫，使其具備獨特性，迫使我們重新審視我們自身的過去，並在衰敗帝國的殘骸中，賦予『定居殖民主義』新的意義。」

這些僅僅是無數段落中極其精采的其中三段。

> 個人影響與公共社會學議程

我現在要分享一些 Michael 對我和我的學術事務的影響。然後，我會談談公共社會學。

Michael 於 2023 年退休時，我像他其他學生一樣，寫了一些追憶文。我想在此分享其中一小部分。我是在 2001 年 9 月開始讀研究所。兩週後，國會投票決定入侵阿富汗，世界從此改變。我記得在最初的幾週裡，Michael 在「社會學 101」課堂上的演講，他大膽批判了即將發生的戰爭，並出色地引導了整個教室的學生對 9/11 及其後果進行批判性思考（當時的美國民族主義情緒達到了歷史最高點）。我從那時起就知道，我找對地方了。

在接下來的幾年裡，Michael 開創了公共社會學的議程，這股熱潮與能量令人感觸深刻，更塑造了我餘下的研究生時光。正如 Michael 在《為公共社會學而戰》(For Public Sociology, 2005) 中寫道：「在成功獲得博士學位的 50% 到 70% 的研究生中，許多人透過在業餘時間從事公共社會學的工作來維持他們最初的承諾——這種行動往往不為導師所知。」如今，雖然我本身不再有導師，但確實是公共社會學在業餘時間維持著我的學術熱情。

Michael 對我當今思想的影響是微妙而深刻、堅如磐石的。我對摩洛哥宗教與瘋狂的研究，反映了我透過他學到的 Fanon 在阿爾及利亞的心理分析工作和創傷的社會學根源。我對印度家庭債務的研究，將我帶回了他所培養的、我的初戀——馬克思主義。確實，Michael 的馬克思主義是我的避風港。

我會被 Michael 吸引，不只因為他在知識上以及個人的魅力，更因為我能在我研究的一切事物中看到異化與階級，無論是我對色情產業的看法（我的碩士論文，Michael 是審查委員），還是對穆斯林少數民族政治動員類型的研究（我的博士論文，他擔任指導老師，這本論文最終出版成書）。

> 分析性思維的導師，他的宗旨始終是改變世界

Michael 鼓勵我在進行民族誌研究時，避開霸權性的權力中心和全球大都會，轉而將焦點放在我的田野地點（法國和印度）中較邊緣的城市。因此，我最終研究了法國東南部的里昂和南印度的海得拉巴。對此我深感感激，因為我得以在邊緣地區生活和學習。透過 Michael，我學會了分析性地思考，當我在組織論點時遇到困難，我便會回到他非常喜歡的二乘二表格中，尋找那些原本難以捉摸的清晰度和銳利度。

Michael 當然也塑造了我對民族誌的理解。在田野中處理深遠的倫理問題和權力關係、研究底層穆斯林社群時，我知道 Michael 在精神上與我同在。我在我的著作的方法論附錄中引用了他的話。

再次引用《延伸個案法》中的話：「無論我們站在哪一邊，管理者還是工人，白人還是黑人，男人還是女人，我們都自動地捲入了一種支配關係之中。作為觀察者，無論我們多喜歡騙自己，我們都站在『我們自己的一邊』…… (Goldner 1968)。我們的使命或許很崇高——擴大社會運動、促進社會正義、挑戰日常生活視野——但知識分子 (

無論多麼有機)與他們所宣稱的選民利益之間的基本分歧是無法逃避的。」

Michael 生活並呼吸著馬克思的《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第十一條：「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而問題在於改變世界。」

我想他的學生都會同意，他最相信的是改變世界和革命，而非為了理論而理論，或為了知識而知識。這股信念驅動著我所做的一切；事實上，它如影隨形地縈繞著我。但在美國社會學界，這種信念卻處境尷尬。我記得多年前，我的課堂上有一位學生給了我一個非常負面的評價。他們寫道：「Parvez 教授的課沒什麼用——除非你想成為一名共產主義革命家。」我不知道我該感到冒犯，還是應該將此視為一種榮譽徽章。我想 Michael 會大笑出聲並感到驕傲吧。正如 Zach Levenson 在一篇悼文中所寫：「Michael 無法忍受經驗主義，但他同樣厭惡理論主義。他認為，社會學馬克思主義的任務是小心翼翼地航行在這兩個陷阱之間。」

Michael 身上另一個值得學習的特質是，他願意隨著世界的變化而改變。同樣地，這也忠實於他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解。儘管他以一種非常特定的方式教授他的社會理論課長達數十年，但他後來開始擁抱 Du Bois，展開了全新的對話，並開始改變他的理論課。在 Du Bois 之前，他與 Bourdieu 有過長期的交鋒。(我記得他曾經以學生的身份選修 Loic Wacquant 關於 Bourdieu 的研究生研討課，並抱怨他的作業有多!) 我很幸運能成為那群學生的其中一員，與 Michael 一起辯論和爭論 Bourdieu 視角的侷限與潛力。Michael 對理解和澄清自己的理論視角有著深切的需求，能夠參與到這種動能當中，是令人興奮的體驗。

> 意志的樂觀主義與繼續前進

Michael 曾在 2011 年寫道：「Antonio Gramsci 最著名的論斷是『理性的悲觀主義，意志的樂觀主義』。理性的悲觀主義指的是社會進程的結構性決定，使得可能性受到侷限。而政治則要求樂觀主義，因為它關注集體意志的形成，旨在消解限制並追求不可能之事。……意志的樂觀主義呼喚理性的悲觀主義，反之亦然。它們是一體兩面的存在。」

儘管有一些線索，但我並不確定 Michael 是否認為美國正逐漸陷入危機當中，以及矛盾是否最終將成熟到足以轉向社會主義的程度。但 Michael 總是支持，並為當代社會運動感到興奮，從佔領華爾街到巴勒斯坦正義運動，他多年來偶爾會討論到這些事。

不過，他經常提醒我們，我們的頭號公共群體是我們的學生。而且，若將我們的處境比喻為身於一場葛蘭西式的陣地戰，大學便正位於戰壕中。對於我們從事教育工作的人來說，我們做重要的任務，也許便是提升學生的士氣，幫助他們看到資本主義體系的核心已經腐敗，看到他們能夠也必須要改變世界。

Michael 總是藉由他一直以來的謙遜說法指出：公共社會學在許多全球南方地區——從南非到印度——就是主流社會學；當他倡導社會學工作必須對公眾負責或與公眾接觸時，他並沒有提出特別新的干預。我認為他是在向全球南方的行動者和社會學家學習。

> 有機公共社會學：是過程還是倫理？

他在 2011 年再次寫道：「公共社會學不能成為劣質社會學的代名詞，它不能是先鋒主義或民粹主義，而是必須以我們作為社會學家所了解的知識為基礎，旨在(與勞工)展開對話。」(2011:75)

我們必須持續在全球南方和全球北方之間進行這些交流，繼續瓦解這種二元對立，邁向 Michael 在其實踐中如此體現的真實團結。我們必須持續真正地以多向度的方式分享知識，與基層社群和社會運動分享我們的見解。我們不會總是一致，對於我們這些民族誌學家來說，我們的論點可能不總是社群想聽到的；但一定要對話和辯論，在這個過程中，我們才能前進——這也是構成傳統的要素。

根據他2021年的一篇論文，我的感覺是，對 Michael 來說，公共社會學日益重要的一點是，它必須超越傳統的為媒體撰稿、投書評論和上電台等方式，轉而與行動者和社群進行「有機公共社會學」的接觸。就我個人而言，這是我一直在努力的方向。對於如何實踐，沒有藍圖可循，我完全是邊做邊學的。我努力找到社會學分析與理論，以及生活現實和那些深受我們想要對抗的暴力與苦難影響的人們進行面對面溝通的那個甜蜜交匯點；無論是與難民社群、移工，還是在街頭抗議的工人階級行動者在一起。

儘管Michael沒有深入探討如何應對權力關係或如何確切地進行這些對話，尤其是在跨越階級鴻溝時，但我認為我們仍然可以以他為榜樣來學習。具體來說，我想知道有機公共社會學究竟是一種過程，還是一種倫理？

Michael絕不會以這種方式來闡述，但根據他的榜樣，我認為有機公共社會學或許必須關乎對科學的承諾，同時也關乎用心與人交往的承諾，以及一種道德信念和品格。

> Michael 的遺產：幽默、活裡、樂觀主義和倫理，支撐我們在震盪的大地上前行

Michael Burawoy 的哪些特質影響了全球數以百計、或許是數以千計的大家？他充滿了開放性、信任他人的直覺、善良而謙遜，並懷有真正的民主精神：他相信人們可以向任何人學習，無論是對他的學生，還是大樓裡的清潔人員，這是一種對待每個人都抱持尊重的倫理。請別誤會，他也會不耐煩，他絲毫無法容忍知識上的懶惰或故作姿態。但 Michael 擁有橫跨全球北方和全球南方的眾多公共群體，而賦予他公共社會學誠信的，正是這種倫理，以及他為人處世的方式。

我對無法再與Michael一同進行這些關於公共社會學和在黑暗時期組織起來的對話深感哀悼。但在我的哀悼階段中，我思考的是如何將我所熱愛的他所擁有的所有特質——他的幽默、活力、樂觀主義和倫理——轉化為我自己的力量。我認為，這就是所有曾受他影響、並有幸向他學習、接受他祝福的人，現在所要踏上的旅程。他在《延伸個案法》中寫道：「當我們腳下的大地總是在震動時，我們需要一根拐杖。」對我而言，Michael Burawoy 那浩瀚的著作（我視其為他的詩篇）和他的倫理（我有幸親眼見證），將成為那根拐杖。 ■

本文基於 2025 年 3 月 1 日，在孟加拉社會理論網絡所舉辦的Michael Burawoy 悼念研討會上的演講內容。該研討會的主題為「公共社會學與全球南方」。

初稿曾發表於《柏克萊社會學期刊》(*Berkeley Journal of Sociology*)

來信寄至：Fareen Parvez <parvez@soc.umass.edu>

> 勞動過程與霸權生產： Burawoy 的貢獻

Aylin Topal, 中東理工大學, 土耳其

我首次親身與 Michael Burawoy 教授會面，是在2013年於安卡拉舉行的國際社會學協會 (ISA) 國家協會理事會會議上。當時他正擔任 ISA 主席。此後我成為該協會的活躍成員，與 Michael 保持聯繫，我們時常在協會會議中相聚，並透過郵件討論重大政治事件。他真的是一位跨學科的社會科學家。身為政治學者的我，正因他那份包容的態度與堅守跨學科問題導向的研究精神，才得以成為 ISA 的一員。

Michael 與我有一位共同摯友：Erik Olin Wright，他於2019年離世。Erik在對抗白血病期間於期刊文章中深刻反思生命、死亡與來世。我記得曾與Michael討論 Erik的物質主義視角——他主張肉身終將化作星塵歸於宇宙，這正是人與浩瀚星河的深刻連結。我深知 Michael 同樣秉持這種重歸自然的人文主義理念。他不僅將以星塵之姿永存，更將透過其著作持續啟迪世人——無數探討資本主義勞動過程本質與階級鬥爭動態的學者，都將持續閱讀與引用他的研究。本文正是為紀念他對學術文獻的卓越貢獻。

> 勞動力

生產過程在經濟理論中佔據核心地位。畢竟，經濟的定義始於生產，生產可被界定為將具特定使用價值的物品，轉化為具不同使用價值的物品。因此，生產對應於新使用價值的創造。正是勞動力作用於生產資料，方能轉化物品以產生新使用價值。此種轉化及其衍生的新使用價值，唯有當其對應更高交換價值時，方對市場具有意義。

資本主義生產的核心蘊含著一種根本性對立 (central antagonism)。在資本主義市場中，勞動者並不擁有生產更高交換價值所需的生產資料。為實現此目標，資本家必須投資於勞動力。這種勞動力投資對資本家而言不可避免，因為唯有勞動力能獨特地轉化為物品，創造出超越物品原有交換價值的新交換價值。投資勞動力之所以有利可圖，在於勞動者創造的價值高於該勞動力本身的交換價值。工資作為勞動的交換價值，是由社會決定，足以再生產勞動力並維持勞動者家庭的水平。與此同時，資本家必須透過讓勞動者工作超過創造等同於工資的新價值所需的時間來獲取利潤。

因此，資本主義勞動過程必然超越使用價值與勞動交換價值的生產，延伸至社會生產的剩餘價值之生產與私有化。資本主義勞動過程涉及兩方面的關係：其一，旨在最大

化榨取未付剩餘勞動的生產；其二，在最低生存水平之上最大化勞動力交換價值的生產。儘管這些張力深植於生產的社會關係之中，但直至1970年代，關於生產與勞動過程的深入研究與積極辯論仍相當匱乏。

> 開創性的批判性著作

1954年，一群社會科學家試圖以比較視角研究各國勞資關係與產業體系，聚焦於經濟發展、勞動市場及國家——企業——勞工關係 (及產業關係)。此類研究的核心動機，在於探索工業化的普世模式，同時揭示各市場獨特的勞動關係與產業形態——這些形態皆受制於各自的文化與政治脈絡。該研究團隊由福特基金會資助，最終於1960年由 Clark Kerr 等人合著出版《[工業主義與工業人](#)》。該著作聚焦各國工業化領導者對實際工業化進程路徑的影響。這些研究未能突破現代化理論框架，僅強調「工業化精英」在維持穩定與促進經濟增長過程中，作為勞資雙方中介者的角色。其功能主義的因果關係觀、脫離歷史脈絡的特性及趨向同義反覆的傾向，未能在學界圈外引發任何辯論。

Harry Braverman 於1974年出版的《[勞動與壟斷資本：二十世紀勞動的貶值](#)》是批判性審視勞動過程在資本主義社會核心地位的先驅著作之一。Braverman主張，資本主義雖標誌著現代技術的興起，但其發展進程卻伴隨著工廠與辦公室技能的普遍侵蝕。他將資本主義歷史解讀為大眾技能退化的歷程——專業技能僅存於極少數工程師與管理者手中，而喪失技能的勞動者淪為可替換的機械附屬品。簡言之，Braverman 強調泰勒主義「無異於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明確表述」。

Braverman的去技能化論述，與Charlie Chaplin 1936年電影《摩登時代》批判工業化與資本主義勞動過程非人化效應的主題驚人地相似。將複雜任務拆解為重複性簡單作業，使工人與勞動本質產生疏離，其存在意義與價值感皆被機器吞噬。資本主義生產過程中的技術性分工確實本質上重塑了勞動過程——複雜生產流程並非無差別的整體，而是透過資本主義分工機制在內部產生碎裂。隨著生產的不同環節將此過程分割化，勞動者不再參與商品經歷的所有轉化過程，而通常僅在其生產的特定階段與之互動。這份對資本主義勞動過程的深刻批判啟發了其他著作，並成功在跨領域學者間引發關於勞動過程的激烈辯論。

>>

「強制與同意之間的相互作用, 掩蓋了資本主義的剝削本質」

> Friedman 與 Edwards 的洞見: 民族誌研究的必要性

自 Braverman 揭開資本主義勞動過程的面紗後, 論戰焦點便集中於一個極其簡單卻至關重要的問題: 工人為何如此辛勤工作? 這引導我們追問: 工人如何將束縛自身的資本主義基本法則內化? Braverman、Edwards 與 Burawoy 對此提出批判性回應。Andrew Friedman 強調資本主義勞動控制的另一面——更具人性的面貌。他主張, 相較於直接管控或監督, 工人被賦予一種「負責任的自主性」, 使其能舒適地認同企業目標。Friedman 著重揭示管理控制因工人抗爭策略而產生的變異性與適應性。同樣地, Richard Edwards 則對職場關係的互動性與策略性本質提出更細膩的觀點。

Edwards 指出, Braverman 的分析傾向於將泰勒主義的主要特徵概括化, 並將其套用於整個資本主義歷史。泰勒主義的科學管理原則在二十世紀的勞動過程控制中留下了鮮明的印記。然而, 它仍應被視為控制管理的一種形式。Edwards 辨識出三種模式: 簡單型、技術型與官僚型, 每種模式代表不同的管理策略。他提出「爭議性」職場的概念, 此類場域的控制權未必絕對, 而是持續在勞資雙方間協商形成。因此相較於 Braverman 對勞動者的被動描繪, Edwards 著重強調職場關係的衝突本質與勞動者的抗爭。儘管 Friedman 與 Edwards 皆將勞動者的能動性納入分析, 卻未能充分解答這些令人困惑的問題。

要解答「工人如何在資本主義勞動過程中同意自身被剝削」的命題, 研究者需具備極致的同理心。在社會科學領域理解研究對象的視角, 本就是複雜且充滿挑戰的任務。研究者必須暫停預設與理論偏見, 方能真實把握他人的生命經驗。然而真正的同理心終究有限, 因研究者的視角本身即受其社會脈絡所形塑。為突破同理心的侷限, 研究者需直接接觸研究對象的現實處境。因此, 唯有透過民族誌研究, 方能解答這些關於勞動過程的關鍵問題。

> Burawoy 的基礎思想

Michael Burawoy 不僅具備非凡的學術嚴謹性, 更擁有深刻的同理心、謙遜態度與反思精神。憑藉這些特質, 他為勞動過程論辯作出貢獻。他與其他學者的主要差異在於: 他並非從研究者遙遠的客觀立場解答問題, 而是從自身作為工廠工人的主觀經驗中推導出答案。他投入大量時間在工廠工作, 這段經歷深刻塑造了他對職場動態、工人同意機制, 以及勞動與資本主義勞動過程之間相互作用的理解。

其著作《製造甘願: 壟斷資本主義勞動過程的歷史變遷》正是基於他在芝加哥聯合公司機器加工廠的工廠工人經歷。Burawoy 精準地從「工人如何主動承擔並再生产管理階層角色」的疑問切入。他指出, 這些問題的答案應在資本主義勞動過程內尋求, 因為該過程同時製造著認可與商品。類似於 Friedman「負責任的自主性」概念化案例, Burawoy 指出工人自覺他們具有選擇權。

正是這種選擇的幻覺, 使工人主動內化了資本主義對勞動過程的控制規則。身為機械操作員, Burawoy 親身經歷了工廠車間的日常運作與人際互動。他敘述自身如何承受生產配額的壓力、管理層的控制, 以及在應對這些壓力時工人間的互動關係。他提供了寶貴細節, 揭示工人如何試圖超越生產配額以換取獎勵或額外的休息時間。他主張這些被稱為「趕工」的遊戲化策略, 實質構成了對自身剝削的默許。他更指出, 過度強調「控制」概念反而模糊了資本主義的真實運作機制——勞動過程中強制與同意的相互作用, 正是掩蓋資本主義剝削本質的關鍵環節。

> 資本主義、社會主義與後殖民社會中的生產政治

他後來在1985年出版的《生產政治學》一書中, 將這些基礎思想拓展至更廣闊的全球宏觀層面。該書聚焦於不同時空背景下的生產政治與制度框架, 提出「生產政治」由國家政策、勞動市場及階級鬥爭動態所決定。在這些決定因素下, 資本主義、社會主義與後殖民社會中的勞動組織與生產現場, 被塑造造成各異的勞動體制與生產政治體系。

在資本主義社會中, 他強調管理層的重要性, 因其以利潤最大化為優先目標。他指出勞動法、福利政策與意識形態元素如何維持對勞動者的控制。在蘇聯的國家社會主義體制下, 由於國家優先事項與勞動者需求存在落差, 勞動者與管理者在官僚控制權的協商中往往導致衝突關係。這些要素催生出社會主義生產政治, 既提供製造共識的不同誘因, 亦建立抵抗機制。最後針對後殖民生產政治, Burawoy 將分析層級提升至全球規模, 闡釋帝國主義關係如何持續主導後殖民語境下的勞動過程。他對全球資本主義如何塑造勞動體制的闡述, 奠定了其對新自由主義勞動過程的觀點基礎。

> Burawoy 將 Marx 的分析轉化為可操作的理論框架, 強調生產力的必然性

透過這兩部互補著作, 布勞威建構出理解勞動過程的完整框架, 將勞動者的日常經驗與更廣泛的政治經濟力量相連結。因此他強調串聯不同層級分

>>

析的重要性，並指出作為資本主義勞動過程要素的「控制」與「同意」應被視為一體兩面——二者對應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雙重本質。他闡明勞動者在職場中同時經歷賦權與壓制，此乃特定生產關係概念與狀態建構霸權的必然環節。

Burawoy的分析必然將勞動生產力的迫切性置於首位。他有效地將Marx對勞動過程的分析轉化為可操作的理論框架：

勞動生活客觀上圍繞生產力進行組織→正是生產力創造了剩餘價值→資本盡可能地自我增值，是資本家的核心驅動力→當貨幣所有者在市場上發現並取得自由勞動力時，貨幣便轉化為可積累的資本→集體中的社會勞動比個別工人更具生產力。更精確地說，勞動作為集體力量才具生產性→資本主義的目標在於盡可能提高利潤率→為實現更多的積累，資本家從大量工人手中購買勞動力，以提升社會勞動的生產力→因此，眾多工人被僱用並並肩工作，無論是在同一生產流程中，或在相互關聯的不同流程中，皆為提升生產力。這條論證鏈引領我們理解Marx所稱的「工人合作」。更進一步，工人合作是依據管理者與監督者代表財產所有者所制定的計劃來進行的。

Burawoy的框架指出，勞動分工並非目的，而是提升生產力的手段。因此資本主義體系透過勞動生產力自我延續——勞動生產力的提升意味著剩餘價值的增產。提升生產力的根本途徑之一在於深化技術性勞動分工。故管理職能在於促進生產力，而非必然執行勞動分工。表面看來，勞動者各自生產商品的局部，但生產實為社會過程。整體產品乃集體勞動所創造。故資本主義勞動過程在將工人轉化為孤立個體的同時，亦透過維持其作為集體勞動力的組成部分，同步建構霸權。正如 Marx 所言，社會生產的集體力量源於將勞動組織為「單一生產體」，其目的在於提升生產力。

> Burawoy 關於階級霸權生產的框架

Burawoy (與Marx相同) 指出，資本家及其管理階層嚴格控制勞動過程。勞動服從資本的現象，實質上源於工人為資本家工作並受其控制的客觀事實。本質上，資本的指揮權界定了勞動過程本身的運作要求。為促進和諧合作與生產性組織的發展，指導權力不可或缺。因此，指導、監督與調整勞動過程的工作成為資本的功能之一。然而，資本家控制勞動過程的動機不僅限於提升合作與生產力。資本與勞動本質上始終處於對抗狀態，雙方爭奪工作時間的控制權與剩餘產品的分配權。管理與監督是遏止職場反抗浪潮的重要工具。Marx 的分析中始終暗含著「同意」的要素。然而，由於 Marx 主要撰寫的是政治文本 (相較於 Burawoy 的社會學文本)，他並未探討勞動階級如何以及為何同意管理階層的統治。

Burawoy的研究為審視階級霸權的生產提供了一個富有洞察力的框架，它聚焦於資本主義勞動過程如何阻礙

對立形式的意識的興起。然而，他指出，由於生產定額的壓力、嚴格的監督以及重覆性的工作，工人在工作場所常常感到不滿和沮喪。這並非精確意義上的階級意識，而是以新的行動模式表現出來的對立意識。儘管工人清楚地體認到企業是通過榨取他們所創造的剩餘價值來盈利的，但他們的訴求僅僅是尊嚴和自主權。因此，工人與生產資料的客觀關係確實會產生衝突，這些衝突以「階級方式」塑造了工人的經驗。正如 Thompson 所指出的，階級總是以不滿和挫折的形式存在，但這些緊張關係並不一定以階級意識的形式表現出來。

Burawoy 運用了 Gramsci 的霸權框架，該框架將同意、強制與集體意志形成的時刻結合起來。Gramsci 提供了一個豐富的理論與概念框架，有助於我們理解在實踐的整體性中個體主觀性的轉變，即集體意志形成的過程。Burawoy 的敘事描繪了工人的日常經驗如何彼此分歧，從而破壞了他們的集體身份和集體意志的形成。這就是為什麼工人之間相互競爭，例如，為了達到個人額外福利的配額。他們的個人經濟利益可能使部分工人難以團結一致。

正如 Filippini 所指出的，Gramsci 將個體定義為在與社會的關係中形成的分層且矛盾的存在。因此，個體被視為由常識塑造的「集體人」(collective man)，在意識形態領域中不斷變化。儘管 Burawoy 在《生產政治》中並未深入進行國家層面的分析，但他指出了意識形態領域的重要性。然而，Burawoy 強調他所指涉的美國語境，其中工人階級缺乏政治和知識領導力，這導致工人之間的相互競爭。因此，分層且矛盾的個體利益是工人無法將其利益轉化為集體有機體的結果。

正如 Panitch 和 Gindin 所指出的那樣，Burawoy 將工會視為工人階級的核心霸權機構，能夠將工人階級的不同部分納入對話之中，並在他們不同的實踐之間進行溝通。很明顯，在缺乏集體政治能動性的情況下，勞動過程本身不會讓工人階級的不同群體基於利益的團結超越其經濟——企業層面的侷限，即便是在純粹的經濟領域也是如此。更糟的是，在全球新自由主義的衝擊下，工人逐漸失去工會作為下層階級行動的主要政治組織的能力。

> 替代結論

Burawoy 的研究基於兩項命題：一、勞動者生活的根本現實是在工作場所中塑造的；二、勞動過程的變革與資本主義結構的轉變密切相關。基於上述命題，仍需針對新自由主義對工作組織的轉型及其對工人集體意志形成的衝擊進行分析。

新自由主義時代加速的私有化進程，顯然對私有化企業的工人造成實質影響——他們往往面臨集體失業與喪失社會權益的處境。然而，工人對這些私有化政策卻僅展現出微弱的不滿跡象。針對私有化過程中未顯現不安徵兆的現象，尚需深入研究。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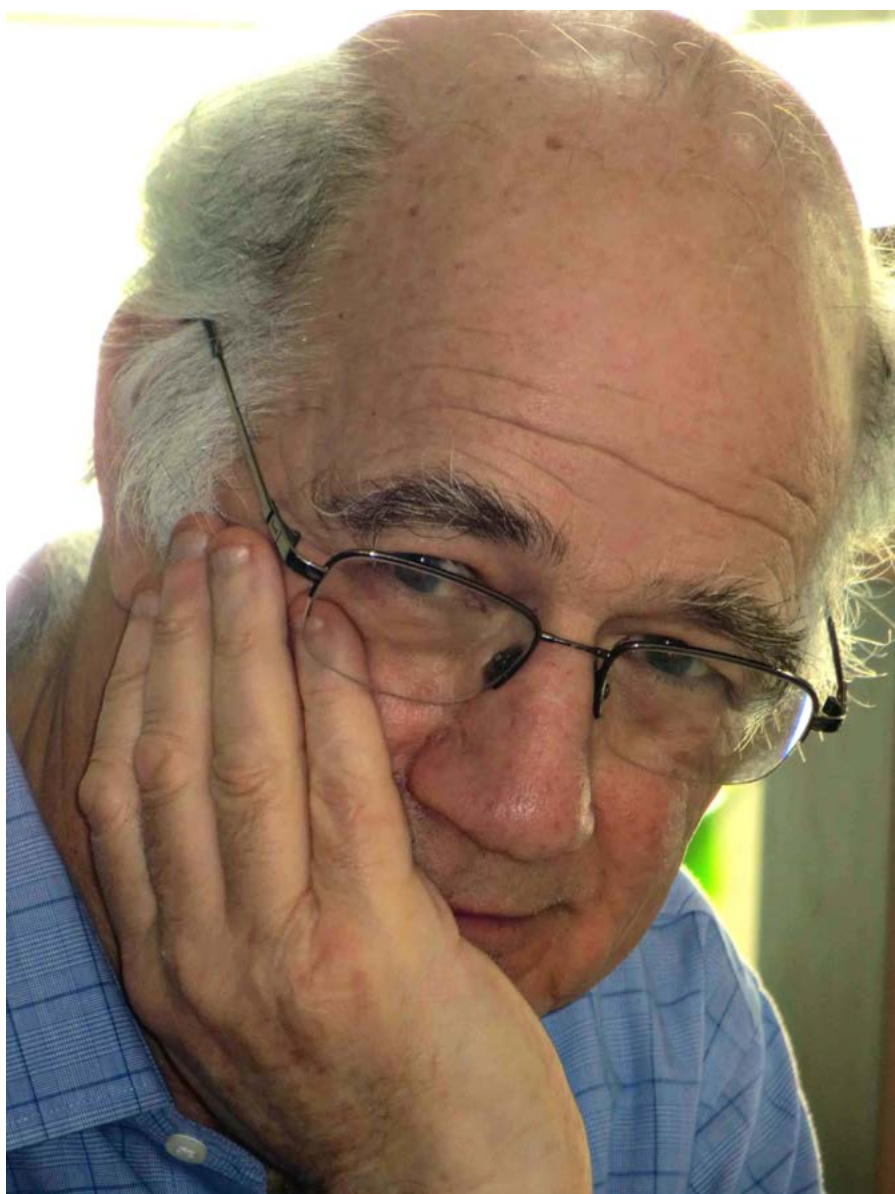
新的研究應凸顯勞動過程與勞動者謀生經驗的核心地位，並分析新自由主義下的霸權與反霸權動態。值得注意的是，在新自由主義時代，勞動者在職場的經驗可能呈現差異性。新的研究不應試圖識別與分析統一且連貫的新自由主義勞動過程，而應採取初始立場，反映勞動過程在經濟不同領域呈現多元形態的觀點。Michael Burawoy 的方法論與概念框架，將持續引導新世代民族誌學者理解其田野工作經驗。 ■

來信寄至：Aylin Topal <aylintopal@gmail.com>

> 與Michael Burawoy 的相遇與辯論

Ari Sitas, 開普敦大學及斯泰倫博斯大學, 南非

Michael Burawoy 在
烏克蘭基輔國立大學莫希拉學院的演講。
照片由Volodymyr Paniotto拍攝，
來源於維基百科。



我是在 1979 年受到我的老師 Eddie Webster 推介了 Michael Burawoy 的著作。他拿著一本剛出爐的書《[製造甘願：壟斷資本主義勞動過程的歷史變遷](#)》走向我。他堅持我一定得在我替他在 Wits 大學授課時使用這本書。他堅稱：「這本書是完美的課堂讀本，與 Huw Beynon 的《Working for Ford》結合，將構成

這門課程的核心。」於是，我便開始試圖理解，工人如何透過在工廠車間裡的各種遊戲與因應機制，來獲得並維持霸權。這本書源自他在一個與 1920 年代 Elton Mayo 曾研究過的場景相似的工廠工作的經驗，那裡的工人透過非正式的團結網絡來因應壓力。但與 Mayo 不同的是，Michael 之所以在那裡工作，是因為他要從一家工廠到另一家工廠，

>>

去探究生產中的政治。這便是他第二本書《[生產的政治：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下的工廠政權](#)》所帶來的禮物。

後來我也發現他與 Eddie Webster 以及大眾史學家 Luli Callinicos 的關係十分緊密——他們都是我的導師，而自從我們在 1989 年杜班(Durban)第一次面對面見面後，他也把他的友誼與關懷慷慨地延伸給我。他對我們在激進工會運動中的工人劇場運動裡所做的工作，以及我們如何實踐自己的「公共社會學」，深深著迷。我們激烈辯論著環繞在我們四周、深陷於所謂納塔爾內戰(Natal Civil War)的社會運動前景。

之後，他兩度在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社會學系接待我，分別在 1993-1994 年與 1999-2000 年。他確實把我從一項痛苦的任務中解救出來——那就是擔任內戰和平協定中媒體與文化委員會的主席。在那裡，我們被要求白天向媒體「包裝」進展，而晚上又得面對暴力再次開始。那是一段難忘的歲月，他把我介紹給他的許多同事與朋友——Peter Evans、Michael Watts、Gillian Hart、Asef Bayat、Michelle Williams，甚至 Manuel Castells——他們全都傾聽並關心南非的轉型。當時麥可已深深被「後公關化」(post-glasnost) 俄羅斯吸引，因此轉型比較在研討會上滿天飛。我則必須回到南非，在第一次真正的民主選舉中擔任非洲國民大會(ANC)的投票監督。

我至今仍記得Burawoy戴著安全帽、騎著他那台運動型腳踏車在奧克蘭(他住處)和校園，以及接近 Monterey Market(我們住處)之間穿梭的模樣，而他不停地說：「你一定要讀這個」、「不，去讀那個」，讓我們的討論持續向前。那時我越來越熟悉他試圖在理論上為那些讓他成為社會學重要人物的民族誌研究工作辯護的努力。

在往後的多年裡，我們有許多次會面，因為南非逐漸成了他的第二個家：2010 年我剛搬到開普敦大學時，他立刻來拜訪我，並介紹我認識他的老友 AnnMarie Wolpe。這位年長的女性主義者當場抓住我，要我加入 Harold Wolpe Trust，以紀念另一位朋友和社會學家。他也想參與我 *Mandela Decade* 一書的發表會(由該信託主辦)，但他當時有緊迫的國際行程。他也試圖在他擔任 ISA(國際社會學協會)主席期間讓我與他合作，但在我已花了八年時間推動該協會的齒輪與軸心之後，我已經筋疲力盡。

2012年，我與他在德里 Ambedkar 大學被 Sumangala Damodaran 組成同一場辯論會，討論我們各自在工廠現場與工人階級社區所做的質性研究。我們對真與假意見相左！我的意思是：他進入工廠空間的途徑，是不揭露自己的真正目的，並將他的馬克思主義影響稀釋成類似人資語彙的說法！但我在種族隔離時期的南非並無法透過管理階層的網絡取得進入途徑，而是透過工廠的工會代表與工會官員。我們也對「民族誌」(ethnography) 一詞意見不同——由於我有某種希臘血統，我始終對這個意指將「ethnos」刻寫到你的研究對象身上的字眼抱有反感！

之後，我們又在約翰尼斯堡見面，當時他正與另一位好友 Karl von Holdt 合作撰寫關於布迪厄的書。然後在弗萊堡線上再度相遇，討論公共社會學與社會學思想的流通，由我們的朋友 Wiebke Keim 主持。還有一次在開普敦，討論大學體制與其新的管理風氣。最後，我們再次在約翰尼斯堡聚首，向我們的朋友 Eddie Webster 致敬，由 Sarah Mosoetsa 與 Michelle Williams 主辦。他也同時向另一位退休但勇敢無畏的朋友 Jackie Cock 致敬。

幾週之後，Michael 便在奧克蘭去世了。

我們失去了一位傑出的職場社會學家、社會學實踐者，以及一位能將社會學的宏觀與微觀趨勢加以統整的偉大統合者。我腦中依然留著他那不安分、充滿劇場感的身影：踱步、粉筆、他為了表達分類而畫出的象限、他的笑聲，以及他對我們所逐漸變成的殘暴姿態所表露出的恐懼。他留給我們的是他對威權民粹主義與種族滅絕式暴力崛起的反思。■

來信寄至：Ari Sitas <arisitas@gmail.com>

> Michael Burawoy: 全球南方社會學者的燈塔

Shaikh Mohammad Kais·拉傑沙希大學·孟加拉

Michael Burawoy教授始終是眾多全球南方社會學者的靈感泉源。他挑戰「單一社會學普世適用」的觀念，並熱切捍衛「全球多元社會學」的存在價值。其著作與演說強調社會學在南方地區的核心地位，質疑全球知識勞動的等級劃分，並主張理論根植於社會的真實經驗。

在孟加拉從事研究期間，我深受他關於去殖民化與解放社會學的觀點影響。而我結識 Michael 的機緣，是2008年Syed Farid Alatas教授邀請我參與2009年的台北會議。當時，我仍是毫無把握的菜鳥研究者，但Michael展現了他的慷慨胸襟，在我的第一次參與國際會議的摘要與論文中，協助與給予了我修改建議。這份鼓勵，我永誌不忘。那時，我亦獲Raewyn Connell教授等資深學者支持，這些經歷都更堅定了我探索獨具南方特色的社會學之路。

Michael著名的四種社會學類型框架——專業型、政策型、批判型與公眾型——促使我反思孟加拉社會學的現狀。在此反思中，我發展出後來稱為「混合社會學」(hybrid sociology) 的概念。此概念意指一種高度依賴北方理論與方法，卻又仰賴南方實證數據的社會學。這種混合狀態本身就是一個危機徵兆：因為南方學科受制於北方的依附關係，使得南方社會學無法完全擁有具自主的知識基礎。在全球南方多數地區，社會學就是依上述的方法成形——這是一種汲取外部典範，卻忽視本土知識與自身社會的現實的狀態。

這樣的混合現象並非偶然間產生，而是出現在具備若干共同條件的社會之中，也就是一種對外部學術資源的高度依賴、外來思想對本地創造力的壓抑、殖民遺緒的持續影響，以及全球知識體系中南方學者邊緣化的處境。這些條件共同催生出一種向外尋求認可與驗證的社會學，而非培養對自身智識資源的信任與信心。

孟加拉正是一個鮮明的例證。在我的國家，社會學作為一門學科其邊界始終模糊不清；在理論、方法與制度層面皆處於弱勢狀態。大學體系深陷結構性與行政上的雙重危機，學術研究往往依附於歐洲中心的知識框架，而非建構植根於在地現實的理論體系。專業學會的力量薄弱，而高等教育中的新自由主義改革，更進一步侵蝕了發展自主

學科領域的可能性。在此脈絡下，就出現了我所謂的「混種社會學」——一種映照我們學術世界內部張力、依附與危機的知識形態。

然而，這場危機同時也孕育了轉化的契機。要重塑孟加拉及其他全球南方社會的社會學，我們必須從根本上推動改革，例如重構課程體系，發展立基於本土知識的理論與方法，彰顯社會學對社會實踐的價值與意義；同時，也可以嘗試強化國家與區域層級的學術組織，培養一批胸襟開闊、具自我反思能力的學者，使他們能以批判與責任並行的態度回應社群需求。

在這些理念形成的過程，Michael的影響深遠而關鍵。他不僅以理論上的洞見啟發我，更親身參與我對「混種社會學」的構思與探索——細讀我的草稿、提出精準的回饋，並鼓勵我不斷精修出精準的論點。最令我難忘的是，他除了擁有卓越的智慧與學術視野，他的真誠、謙遜也令人深受感動。對一位來自孟加拉、默默無聞的年輕學者而言，能獲得全球社會學領軍人物如此專注的關懷與鼓勵，既是莫大的榮幸，也成為我持續前行的深刻動力。

除了學術上的深遠影響，我永遠不會忘記麥可溫暖又充滿人性的光輝。在各類學術場合中，他總是平易近人、幽默風趣，並慷慨地撥出時間與人交流。我記得有一次在台北的會議上，他主動詢問我對中央研究院的餐飲與接待有何感想，隨後還打趣地說：「既然Shaikh說好吃，那就一定是很不錯！」那一刻，我被他的親切與幽默深深感動。2023年墨爾本世界社會學大會上，我如同狗仔般緊隨在他身後，只為了與他合影留念。他笑著看我滑稽的舉動，並以誇張又風趣的姿態配合演出。後來，當他得知我當選國際社會學協會 (ISA) 執行委員時，送上的祝賀充滿真誠與喜悅，讓我再次感受到他發自內心的支持與鼓勵。

對我而言，Michael始終是一座燈塔。正如船隻仰賴航標穿行於黑暗之中，我亦倚靠著他，在這片錯綜複雜、常令人困惑的全球社會學海域中，才得以找到方向。他的思想遺產——對公共社會學的理想、對全球北方知識霸權的批判，以及對實踐性與去殖民知識的堅定捍衛——深刻地塑造了我的學術生涯，並將持續引領全球南方無數學子的前行之路。

「公共社會學、對北方霸權的批判、 對參與與去殖民知識的辯護」

Michael還創辦了國際社會學協會的期刊《全球對話》(Global Dialogue)，為世界各地的學者與思想者搭建了交流的平台。我們在孟加拉的團隊曾計畫以該期刊名義舉辦國際會議，我原本盼望能邀請他親臨達卡。然而，這個願望如今已無法實現。

親愛的Michael，您的身影將永遠銘刻在我心中。您以思想與行動照亮了我們的道路。願您安息。■

來信寄至：

Shaikh Mohammad Kais

<skais11@yahoo.com>

> 紀念Michael Burawoy： 一個探討南非小型巴士計程車產業的馬克思視角

Siyabulela Fobosi, 福特海爾大學, 南非

Michael Burawoy是社會學界的指標性人物，尤其在公共社會學的領域中，他的民族誌方法以及對馬克思主義的洞見重塑了我們對勞動、資本主義還國家權力的理解。他的作品提供後續學者一種分析資本主義經濟下剝削與抵抗機制的批判視角。為了頌揚Burawoy的學術貢獻，我們發現他的理論在當代的研究中仍具有深遠影響，包括對南非小型巴士計程車產業的探討。

Burawoy出版於1979年的經典之作《製造甘願》，奠定了工人在資本主義體系下如何面對剝削的理論基礎。他揭示工人往往在工作場所的制度結構以及國家政策的運作中，被動地接受自身受支配與壓迫的處境。他對國家干預和資本主義改革的批判，提供了一個剖析非正式勞動市場的有力框架。此一理論在南非小型巴士計程車產業的應用尤為貼切，這是一個非正式卻極為重要的產業，它源起於種族隔離時期，至今仍在高度不穩定的勞動條件下持續運作。

南非在1980年代開始放鬆對產業的管制，允許企業快速擴張，如此作為與Burawoy「策略性選擇」的概念相呼應。在這樣的國家政策下，政府有意識地偏袒正式的資本主義企業，使非正式經濟遭到忽視與邊緣化。這樣的理論視角可以解釋為什麼像計程車汰舊換新計畫 (Taxi Recapitalisation Programme, TRP) 等持續性的政府干預，無法有效改善小型巴士計程車司機的生計；反而只是持續服務於資本利益，持續推動公共建設的現代化，卻忽視勞動條件的改善。

我與其他學者對小型巴士計程車產業所提出的社會學研究，正好呼應了Burawoy對勞動碎片化以及勞工結構性剝削的洞察。我的研究闡明了小型巴士計程車司機如何在沒有合約、福利和法律保障的情況下，面對持續的經濟不安全，並在市場導向的競爭中不斷失去議價能力。我對國家政策的分析強化了Burawoy的論點，指出資本主義結構下的改革多側重於經濟效率而忽略了工人的權利。

正如Burawoy提醒我們的，如果想促成有意義的改變，我們需要的不只是政策的轉向，更需要組織化的抵抗以及結構性改革。透過應用他的馬克思理論框架，學者與社會運動者可以提倡以保護勞工為優先的改革、公平合理的政府補助以及小型巴士計程車司機的集體議價能



1982年修訂版《製造同意書》封面。
圖片來源：芝加哥大學出版社。

力。這些努力不只是為了紀念Burawoy思想遺產，更是為了推動非正式勞動領域正義的重要實踐。

Michael Burawoy對公共社會學的投入，彰顯了以學術實踐介入社會不公的必要性。他的研究成果持續引領著那些致力於剖析資本主義矛盾並倡導公平勞動關係的人們。在紀念他的學術貢獻之際，我們重申了社會學在促進更公正、更人道的社會中所佔有的重要角色。■

來信寄至：

Siyabulela Fobosi

sfobosi@ufh.ac.za

> 可行烏托邦的元素週期表

David Goldblatt, 獨立社會學家與記者, 英國

THE PERIODIC TABLE OF A FEASIBLE UTOPIA

1 L _o LOVE																		2 F FAMILY			
3 H _o HOPE	4 C _a CIVIC ACTIVISM															5 G _e GENDER EQUALITY	6 A ART	7 P PARTIES	8 F _{nd} FRIDAY NIGHT DINNER	9 L LESBIAN	10 F _r FRIENDSHIP
11 E _m EMPHASY	12 S _o SOLIDARITY															13 R _j RACIAL JUSTICE	14 P _y POETRY	15 C _c CEREMONIES AND CELEBRATIONS	16 J _{zz} JAZZ	17 G _o GAY	18 R _o ROMANCE
19 C _o COMPASSION	20 M _a MUTUAL AID	21 D _d DAY DREAMS	22 S _h SOCIAL HOUSING	23 W _k WALKING	24 P _m PLAYGROUNDS AND HEADGONES	25 R _d REDUCE	26 G _{nd} GREEN NEW DEAL	27 U _{bi} UNIVERSAL BASIC INCOME	28 R _w REDISTRIBUTION OF WEALTH	29 W _x WEALTH TAX	30 R _j RESTORATIVE JUSTICE	31 N _d NEURODIVERSITY	32 R _k RANDOM KINDNESS	33 F _e FESTIVALS	34 P _s THE POKER SCHOOL	35 B BISEXUAL	36 S _x SEXUAL ECSTASY				
37 R _o ROOTS	38 C _z CITIZEN JURIES	39 P _d PORTABLE PARADISE	40 P _p PEOPLES PALACES	41 C _y CYCLING	42 U _f URBAN FORESTS	43 R _p REPAIR	44 C _e CLEAN ENERGY	45 U _{hc} UNIVERSAL HEALTHCARE	46 F _w FOUR-DAY WORKING WEEK	47 C _x CARBON TAX	48 D _l DRUG LEGISLATION	49 D _r DISABILITY RIGHTS	50 S _d SINGING AND DANCING	51 F FEASTING	52 H _s HOT SAUNAS	53 T TRANS	54 N _g NEIGHBOURHOOD				
55 L _a LAUGHTER	56 D _c DECENTRALISATION	57 I _c IMPROBABLE CONNECTIONS	58 P _t PUBLIC TRANSPORT	59 S _k SKATING	60 C _f CITY FARMS	61 R _c RECYCLE	62 R _a REGENERATIVE AGRICULTURE	63 U _{cc} UNIVERSAL CHILD CARE	64 U _w USEFUL WORK	65 L _w LANDVALUE TAX	66 E _p EMPTY PRISONS	67 R _c RIGHTS OF THE CHILD	68 P _l PLAY	69 G _t GOOD TIMES	70 S _w SWIMMING WITH PILES	71 Q QUEER	72 C _t COMPLAINTS				
73 B _a BALANCE	74 P _v POLITICS AS AVOCATION	75 C _t CRITICAL THINKING	76 P _s PUBLIC SPACE	77 P _d PADDLING	78 R _a ROOFTOP ALLOTMENTS	79 R _x RELAX	80 R _w REWILDING	81 U _{sc} UNIVERSAL SOCIAL CARE	82 L _i LIFELONG LEARNING	83 F _x FINANCIAL TRANSACTION TAX	84 P _f THE PLEASE FORCE	85 I _{fg} INTERESTS OF FUTURE GENERATIONS	86 T _h THERAPY	87 G _d GOOD DEATHS	88 U _p UNUSUAL PEOPLE	89 + PLUS	90 C _e CHANCE ENCOUNTERS				
1 FUNDAMENTALS	2 MICROPOLITICS	3 IMAGINARIUM	4 CIVIL CITIES	5 SELF-PROPULSION	6 URBAN BOTANICALS	7 CIRCULAR ECONOMY	8 ZERO CARBON	9 UNIVERSAL WELFARE	10 LIFEWORK	11 TAX JUSTICE	12 UNHOSTILE EMPLOYMENT	13 THE RIGHT STUFF	14 FOOD FOR THE SOUL	15 COLLECTIVE ENERGY	16 WINE ALL NINE	17 NIGHT SO QUEER AS	18 SOURCES OF ENTRANCY				

©David Goldblatt www.feasibleutopias.org

「可行烏托邦的元素週期表」是David Goldblatt創作的一件藝術裝置，將化學元素取代為一個理想且合理的社會組成部分。

我並不確定元素週期表的靈感究竟是哪裡來的，但姑且就歸因於封城期間的瘋狂吧。然而我確知其中蘊含了多重元素。兒時初次在百科全書中邂逅它時，便為那些彩色矩形排列的視覺愉悅與神秘命名法深深著迷。身為化學系畢業生，我始終敬佩並驚嘆於其蘊含的科學智慧與智性優雅。身為 Primo Levi《元素週期表》的讀者，我欣喜地發現這張表格竟能轉化為如此豐沛的隱喻疆域——既是電子結構的網格，亦是情感結構的框架。

當然，另類週期表未曾有缺——隨意瀏覽網路，你會發現咖啡版、約克郡版、髒話版，有些滑稽，有些嚴肅，但 Mendeleev 值得更好的詮釋。更深邃的？更驚人的？我曾思索各種宣言——藝術的、詩意的、政治的及其他——並疑惑：在注意力如此支離破碎、意識如此碎片化的時代，這些文本是否因過於冗長、過於文字化、過於線性而難以存續？在 Instagram 時代，烏托邦宣言該是什麼模樣？我的答案——而更多答案尚待發掘——便是《可行烏托邦元素週期表》。

>>

它最初以鉛筆與鋼筆的姿態誕生於素描本，隨後轉為數位形態，再被印製在硬紙板上，懸掛於某個藝術計畫借予我的巨牆上，靜靜佇立一個午後。後來我製作了海報——就像你眼前 Michael 正在審閱的那張——並在布里斯托爾市中心某座破舊商場的閒置店鋪裡，搭建起這張「週期表之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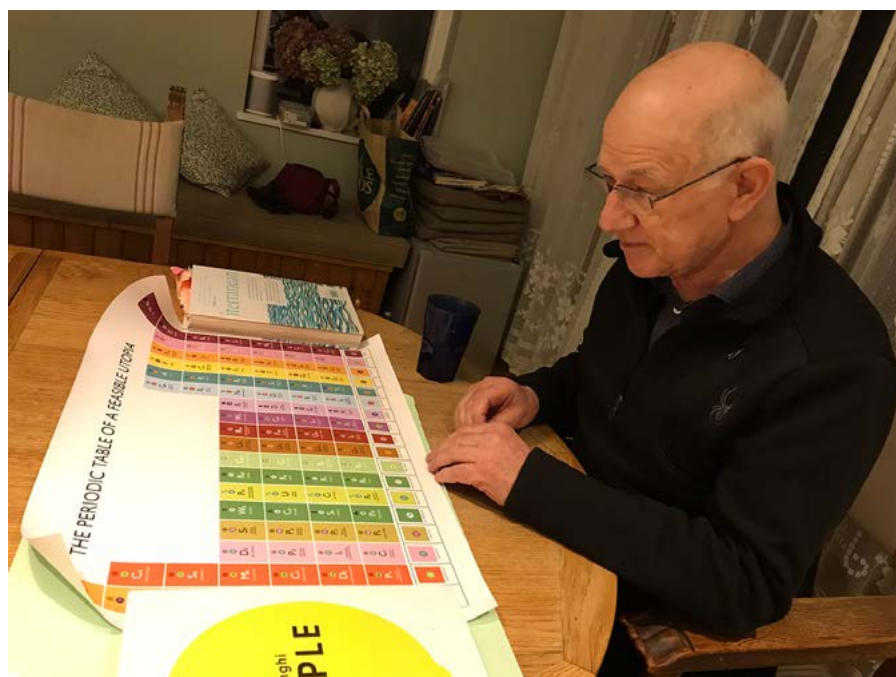
我們將店鋪改造成名為「烏托邦化學」的藥房，邀請公眾探索元素週期表。若訪客駐足，我們便告訴他們：我們並未壟斷智慧。在他們心目中的烏托邦願景裡，是否存在想添加的元素？若有，我們便把它製造出來。我們會印製兩張該元素的明信片，將其中一張贈予訪客，另一張則張貼於牆面，以此創造第二件藝術品：《屬於民眾的、可行烏托邦元素週期表》。

Michael Burawoy 對《可行烏托邦元素週期表》極為推崇，視其為 Erik Olin Wright「真實烏托邦」概念的視覺化呈現。我認為 Michael 會熱愛這個互動且通俗的版本，尤其那些關於世界可能樣貌的瘋狂、親密且不拘一格的對話——對話對象往往是那些未能充分暢想烏托邦的人們。我想這或許適用於我們所有人。■

來信寄至：

David Goldblatt

tobaccoathletic@yahoo.co.uk



Michael Burawoy 興致勃勃地看著一張「可行烏托邦元素週期表」的海報。2024年，倫敦。



前來參觀英國布里斯托購物中心「可行烏托邦元素週期表」裝置藝術的訪客，被邀請提出自己的建議，以創造第二個「人民」元素週期表。

> 屬於社會學的時刻

國際社會學會 (ISA)

當國家領導人鼓吹對科學的不信任，對社會科學的攻擊日益加劇之際；
當假新聞的傳播範圍與影響力超越基於研究的分析之際；
當眾多政治領袖散播仇恨言論，剝奪部分民眾享有完整公民權之際；
當整類人群再度被非人化，成為鞏固權力的普遍手段；
當科學證據遭否認，只為迴避系統性環境與社會危機；
當國家鎮壓那些揭露種族滅絕、系統性暴力與種族主義的異議者；
當空前財富集中使少數億萬富豪掌控大眾與社交媒體；
當人類面臨相互關聯的全球性危機，這些危機將決定未來世代的命運；
當學術自由遭受威脅，即便在成熟民主國家亦然；
我們堅信社會科學家的批判性介入比任何時候都更為關鍵。
我們重申作為研究者、教育者與公共知識分子，我們工作核心的價值觀與承諾。

我們主張：

- 基於事實與分析的嚴謹社會學，拒絕簡單敘事，擁抱世界的複雜性；
- 獨立的社會學，提醒我們權勢者的話語未必真實，千遍重述的謊言終究是謊言；
- 批判性社會學，質疑日益加劇的不平等現象，挑戰白手起家神話、市場與消費主義的簡化論述，以及頂尖男性氣質的迷思；
- 公共社會學，參與公民辯論時不居高臨下自詡智識優越，而是與致力變革社會、捍衛公共利益者展開對話；
- 一門通論性社會學，抵禦過度專業化與碎片化的風險，直面當代急迫課題；
- 一門全球性社會學，向世界各地的研究者與社會行動者學習如何理解並應對二十一世紀的挑戰，共同構築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認知。

「社會學已成為要共同生活在地球上 不可或缺的工具」

我們堅信社會科學與學術自由乃民主之本，必須加以守護與促進。

我們認為，基於充分資訊、歷史根基與社會學相關性的公共辯論，對於理解並應對當代危機至關重要。

我們確信，社會學不僅能幫助我們理解世界，更能協助建構更公正、宜居、和平且永續的未來。

在氣候變遷、戰爭、日益加劇的不平等與仇恨的時代，社會學已成為人類在有限地球上共存不可或缺的工具。

此宣言由 ISA 協會主席 Geoffrey Pleyers 於 2025 年 7 月 6 日在拉巴特舉行的第五屆 ISA 論壇上發表。本宣言獲得 ISA 歷任主席 Sari Hanafi、Margaret Abraham、Michel Wieviorka；現任副主席 Allison Loconto、Bandana Purkayastha、Elina Oinas、Marta Soler；以及歐洲社會學協會主席 Kaja Gadowska、拉丁美洲社會學協會主席 Jesus Diaz、拉丁美洲社會科學 (CLACSO) 理事會主席 Pablo Vommaro 共同支持。■

Rabat 2025 年 7 月

46

我們正收集社會學家個人及社會科學界成員的聯署支持。
[請填寫此表格](#)，加入我們的行列，共同簽署這份承諾與團結的集體聲明。



